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4/7
9 February 198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智利的人权问题

秘书长的说明

智利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委员会1983年3月8日第1983/38号决议编写了本报告，作为对依同一决议提交联大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报告(A/38/385和A/38/385/Add. 1)的补充。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8	1
一、 支配人权的法律体制		2 - 29	3
A. 宪法与紧急措施		9 - 16	3
1. 1980年的政治性宪法		9 - 13	3
2. 紧急状态的体制化		14 - 16	4
B. 法律程序的保障		17 - 29	6
1. 补救办法的性质、可引用性和有效性		17 - 24	6
2. 军事审判权		25 - 29	10

第一部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二、 生命权、享有人身和人格尊严的权利		30 - 61	12
A. 生命权		30 - 50	12
1. 关于滥用职权、滥用武器的指控		32 - 48	12
2. 死刑		49 - 50	13
B. 享有人身和人格尊严的权利		51 - 61	13
1.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51 - 56	18
2. 人身和人格尊严权利受司法保护的程度 ...		57 - 61	20
三、 人身自由权和个人安全权		62 - 103	23
A. 人身自由权		62 - 85	23
1. 逮捕或拘留		62 - 83	23
(a) 在公开集会上进行逮捕		66 - 76	24
(b) 逮捕的任意性		77 - 82	28
(c) 逮捕的非法性质		83	31
2. 任意和非法逮捕受司法监督的程度		84 - 85	31

目 录 (续)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B. 个人安全权	86 - 97	32
1. 关于迫害和恐吓行动的指控	86 - 92	32
2. 监狱中的拘押情况	93 - 97	34
C.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98 - 103	35
四、迁徙自由权	104 - 115	38
A. 自由进出本国的权利	104 - 110	38
B. 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111 - 115	40
五、隐私权、思想自由、意见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 ...	116 - 128	42
A. 隐私权	116 - 122	42
B. 思想自由、意见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	123 - 128	44
六、公共自由权利	129 - 142	47
A. 和平集会权利	129 - 136	47
B. 结社权利	137 - 140	49
C. 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141	50
D. 请愿权	142	51

第二部分

经济和社会权利

七、经济和社会权利	143	52
A. 工作权、平等就业权	143	52
B. 工作条件	143	52
C. 儿童和青年受特别保护的权利	143	52
八、工会权利	144 - 159	53
A. 工会结社的权利	144 - 156	53
B. 集体谈判的权利	157	58
C. 罢工权	158 - 159	58

目 录 (续)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九、文化权、少数民族的权利	160 - 161	59
A. 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	160	59
B. 土著少数民族的权利	161	59
十、结论和建议	162 - 187	60

附件一、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 60 人名单(1983年9月至11月)

附件二、为保安部队枪伤的 80 人名单(1983年9月、10月)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在其1983年3月8日第1983/38号决议第11段中决定将专题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要求他向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和第四十届人权委员会汇报智利人权的其后发展情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1983年5月27日第1983/149号决议中认可了这个决议。

2. 由于当时的专题报告员不幸去世，人权委员会于1983年6月1日指派了新专题报告员。1983年10月17日他在第A/38/385号文件中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题为“智利人权的保护”。

3. 1983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以89票赞成、17票反对、38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智利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第38/102号决议。该决议第14段“请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彻底研究专题报告员的报告，以采取有效恢复智利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最适当步骤，其中包括将专题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4. 专题报告员试图获得智利政府在执行人权委员会1983年12月8日第1983/38号决议方面的合作，但没能成功。¹ 1983年12月8日，智利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重申了他本国政府的立场：“只要智利继续受歧视性待遇，它就拒绝参与人权委员会或联合国大会发起的任何行动。”² 但是，专题报告员指出，智利政府还是就智利人权情况的发展向秘书长递送了两份备忘录，被列入给联合国大会的补充报告中。专题报告员希望，智利政府的这种表示是智利政府同专题报告员建立合作、完成其使命的第一步。³

5. 特别报告员自己已评论过智利政府继续拒绝承认他的使命的问题，指出，人权委员会规定的这类特别程序“无需得到有关国家的同意，因为这种程序是根据委员会一般固有的权力、非经社理事会第1503号决议而制订”。⁴

¹ A/38/385，第5至8段。

² A/C.3/38/SR.69，第51段。

³ A/38/385/Add.1，第3、第4段。

⁴ A/38/385，第10段。

6. 联合国大会也再次表示遗憾：“智利当局蔑视大会、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一再发出的恢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呼吁，继续拒绝同人权委员会及其专题报告员进行合作”⁵……“再度请求智利当局同专题报告员合作并就专题报告员的报告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意见。”⁶

7. 专题报告员起草本文件与向联合国大会作有关报告用一样的方法。⁷智利政府的不合作使专题报告员很难判断智利人权状况最新的发展方向。而且该政府也不再按联合国大会报告增编的程序，向秘书长提供消息或意见。

8. 这份文件所包括的时期反映了1983年9、10、11三个月智利人权情况的最新发展，与第A/38/385号和第A/38/385/Add.1号文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报告相配合。为了准确起见，本报告也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1983年12月的材料。

⁵ 联合国大会1983年12月16日第38/102号决议序言第5段。

⁶ 第38/102号决议第13执行段。

⁷ A/38/385，第11、12段。

⁸ A/38/385/Add.1，第3、5段。

一、支配人权的法律体制

A. 宪法与紧急措施

1. 1980年的政治性宪法

9. 联合国大会表示关注：智利颁布人民对之无从自由表达意志的宪法，其中的规定非但不能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反而禁止、中止、限制了人民享受和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破坏了传统的民主法律秩序和制度”。⁹因此，大会再次要求智利当局“重建法治原则、民主制度，在毫无歧视的情况下恢复人人可切实享受和行使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基本自由”。¹⁰

10. 专题报告员已指出，智利成立了一个根本宪法研究委员会，智利国务院也发起了有关政治权的行使、特别是有关政党、选举制度、全国代表大会的职能等根本宪法的研究。¹¹ 1983年12月19日，据智利报纸的报导，国务委员会和根本宪法委员会指定的一个两人小组委员会，负责起草了一个政党根本法的初步草案。根据该草案，政党是“由享有法律身份的公民自愿组成，能促进立宪民主制度的施行。”（第1条）。组成一个政党至少需要有两万人以上（第4条）。政党可以被解散、特别是如果“宪法法院承认该政治组织、政治运动或政党宣传有害于家庭的思想，或鼓吹暴力，或鼓吹极权性质或以阶级斗争为本的社会、国家或法律概念，而被公认为违反宪法”（初步草案第32条，针对宪法第8条）。此外，根据初步草案第48条，“不根据法律组织政党，结社成帮进行政党政治活动”，是可惩罚的罪行。搞这种结社或进行这类活动的事实本身就是罪行。

11. 关于宪法的发展，1983年10月19日，共和国总统宣布“政府的意图是，有关政党的根本宪法获得通过，这些政党选出领导人之后，就开始研究和颁布其他政治法令。然后，经过公民投票的批准，就在宪法规定的日期之前成立全国

⁹ 联合国大会1983年12月16日通过的第38/1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

¹⁰ 同上决议，第5执行段。

¹¹ A/38/385/Add. 1，第7段。

人民代表大会。”

12. 专题报告员指出，到目前为止，已预告的根本宪法仍没有颁布，“休止政治活动”的措施仍继续施行，促进人民参政的途径仍不存在。¹²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只能以实际行动参与政治，在1983年9、10、11月期间，组织了“全国抗议日”和其他公开形式的示威。这种行动的后果本报告将进一步分析。¹³ 关于这些“抗议”，联合国大会表示关注，认为：“当局未能恢复人权和基本自由，已引起人民日益激烈的抗议，对这种抗议强行镇压的结果，已导致有计划的公然侵害人权的严重事件，其中包括大批逮捕和多人的死亡”。¹⁴

13. 专题报告员也提及1983年9月12日7位律师向宪法法院提出的宪法公訴，要求法律当局宣布现任内政部长失职。公訴理由是：1983年9月6日内政部长公开宣称：“公民应该…组织互助组、区民委员会等街道单位，以保卫现有体制”。¹⁵ 1983年10月27日，宪法法院驳回了公訴，理由是对内政部长的指控不能说明他“因不胜任而不得继续任职”。因此，根据宪法第82条(10)的规定，对他的起诉必须撤回”。法院还裁决：“宪法法院无权决定由于违反宪法第6条而产生的责任和后果”(第6条规定：“国家机构的行动必须根据宪法，并符合宪法规定的准则”)。关于内政部长号召人民组织起来、铲平动乱、保护自身不受非法侵犯、以补助而非代替警察治安行动的言论，宪法法院裁决：“这并不违反指控所提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只是表示了个人自卫的基本权利以及智利人民帮助当局维持内部秩序的宪法责任”。因此，宪法法院认为，内政部长的讲话是符合宪法第22条的，该条规定：“智利人有基本义务去为祖国争光，保卫国家主权，保护国家安全，维护智利传统的基本价值”。由于这些理由，宪法法院驳回了对内政部长的控诉。

2. 紧急状态的体制化

¹² A/38/385, 第17、18段; A/38/385/Add. 1第8段。

¹³ 见第三章A，1(a)节：在公开集会上进行逮捕。

¹⁴ 联合国大会1983年12月16日通过的第38/1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

¹⁵ 关于背景情况，见A/38/385/Add. 1，第12段。

14. 联合国大会再次对“紧急状态的体制化”表示关注，要求智利当局“取消不断严重侵犯人权的特殊情况和紧急状态”。¹⁶

15. 专题报告员已汇报，1983年8月28日智利取消了两种紧急状态中的一种。但是，接着即根据1983年9月7日的第1043号法令，宣布：“由于内部和平受威胁，延长紧急状态”。¹⁷ 不妨回忆，当“发生破坏公共秩序的暴力行为，或者存在扰乱内部和平的威胁时”共和国总统有责任宣布新的紧急状态（宪法第二十四临时条款）。这项规定影响到结社自由权、言论自由权、行动自由权。此外，也应提及国防部1983年9月8日第147号法令的执行。根据这个法令，先前的“紧急区域司令官”现被改为“军区司令”。¹⁸ 根据这项法令，军区司令有责任“保证他们指挥的部队长官相互合作，随时向这些长官汇报任何可能影响他们行使职责的问题”。必须指出，这个法令并没有规定“军区司令”的任期，尽管法令的第1条声称他们的职位只是“临时性的”。根据这个程序，智利所有地区部都派有军区司令。这些措施的显著作用是保持智利全国的军事化。

16. 因此，专题报告员的结论是：“紧急状态的制度化并没有改变，宪法的临时条款和其他补充性法律规定都仍然存在”。¹⁹ 在这些法律规定中，还应提及1981年7月14颁布的第18015号条例²⁰，规定任何人违反“共和国总统按共和国政治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行使职权所采取的措施”者，应受严厉处罚。这显然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如果看《公约》第4(1)款，至今已长达十年的紧急状态本来就不合理。²¹

¹⁶ 联合国大会1983年12月16日通过的第38/1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第5段。

¹⁷ A/38/385/Add.1，第14段、第15段。

¹⁸ A/38/385/Add.1，第16段(c)。

¹⁹ A/38/385/Add.1，第18段。

²⁰ 1981年7月27日《官方每日公报》。

²¹ A/38/385/Add.1，第18段。

B. 法律程序的保障

1. 补救办法的性质、可引用性和有效性

17. 联合国大会重申：“深为关切人身保护令的引用，由于智利司法机构在这方面极受限制、未能充分行使其职权而毫无效果”。²²

18. 专题报告员已报导：宪法第41条(3)施加的限制（对紧急状态法令不得引用补救措施）已被取消。但是，任何人凡是根据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的措施被拘禁者仍然难以援引人身保护令作为补救。因此，唯一的有效补救是通过内政部长向共和国总统请求搁置。在这些情况下，一般来讲法院不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对什么性质的行动可以施行特别措施，只肯“确定”宪法本身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是否已被遵循。在这方面，专题报告员坚持其早先的意见，即：“为了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人身保护令和类似的补救办法不应被取消，因为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所规定，即使一个国家实行紧急状态期间，这些权利也不容克减”。²³

19. 下表一显示，在1983年头十个月中，圣地亚哥城要求人身保护的申诉数目持续增加。这个表根据的是专题报告员从一些智利保护人权组织那里收到的数据资料。

²² 联合国大会1983年12月16日通过的第38/1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

²³ A/36/385/Add.1，第19段。

表 1

要求人身保护的申诉 1983年，圣地亚哥城

月 份	为囚犯提出	早期申诉书	为流放者提出	共 计
一月	10 (22)	5 (5)	3 (3)	16 (30)
二月	12 (32)	6 (8)	- (-)	18 (40)
三月	64 (138)	8 (8)	1 (1)	73 (147)
四月	24 (32)	4 (5)	- (-)	28 (37)
五月	88 (321)	6 (9)	- (-)	94 (330)
六月	76 (149)	8 (8)	- (-)	84 (157)
七月	54 (126)	17 (19)	- (-)	71 (145)
八月	73 (222)	10 (13)	2 (2)	85 (237)
九月	91 (158)	13 (18)	2 (2)	106 (178)
十月	24 (37)	10 (11)	11 (11)	45 (59)
共计	516 (1207)	87 (104)	19 (19)	622 (1361)
同期间共计：				
1981年	223 (369)	77 (124)	14 (14)	314 (513)
1982年	178 (315)	32 (77)	11 (15)	221 (407)

注：括号中数字指申诉所涉人数。

20. 1983年头十个月，共提出622宗人身保护申诉，涉及1369名囚犯，实际上比1982年（221宗申诉）和1981年（314宗申诉）同期的数字更高。这些申诉大部分被法院驳回。它们的裁决也同专题报告员过去所指出的申诉手续和在智利高级法院里安排“陪审法官”的作法一样，带有程序上的缺点。²⁴ 在这方面必须提到非属于真正正常法律程序的军事审判的特殊性质，在下一节中详述。

21. 但在这种消极的情况下，专题报告员也注意到一些法院判决，虽然属于非常性质，但似乎也证实了他的希望：即智利法院仍有可能恢复处理此类申诉的传统职能。这些判决中有一项由圣地亚哥上诉法院1983年11月22日作出，批准了以一位工人阶级社会领导人，José Santos Tamayo Velasquez名义提出的请求人身保护的早期申诉。在这项判决中法院认为：“国家情报局无权执行逮捕令，因为成立该机关的第1868号法令没有授与这种权利。”法院进一步裁决：国家情报局拘留中心不是“公开场所”。第二，关于国家情报局官员的权力，塔尔卡上诉法院1983年10月18日裁决：“国家情报局官员的陈述”可以被怀疑，只能当作一种法律推断；不能正式作为证据。第三，当5名人士因参与夺地运动被指称破坏治安时，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上诉法院在1983年10月18日的判决中竟引用紧急状态为由，减轻了对他们危害国家内部安全罪行的惩罚。该法院判定：“住房条件已被证明害及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发展，违反人类尊严”，被告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眼前的危害，犯下了侵犯别人财产的罪行。这样就同时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是被告所设法避免的危害是实在的、紧迫的；第二是这种危害同结果所引起的损害相比则更为严重。

22. 此外，圣地亚哥上诉法院于1983年12月7日判决核可了以Tomás Ferando Innostroza Catalán名义请求人身保护的申请，承认其有在智利居住、自由进入和出国的权利。在这案件中，法院自认有权决定政府禁止某人进入智利是否有法律依据，因为政府原来的禁令是在智利实行紧急状态时作出的。该法院宣布：法治固有的一个概念是，法院有行使最高法律职能的司法权，而这种司法权中的一个因素是：“无论哪一级当局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审查，以确定其行为是否合法”。这个案件的主要问题是，法院是否有权决定涉及自由进入祖国的基本人权

²⁴ A/38/385，第43、44段。

的行政命令的法律依据。该法院认为，放弃这种司法权会违背了“历来建国元勋的理想，动摇了公法概念的基础”。法院还认为，“对紧急状态和戒严状态的措施申请人身保护，只有当这些措施是由首先经法律机构承认的主管当局采取、并首先经法律机构认为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时，才可以予以拒绝”。因此，不得绝对地禁止对当局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事实根据进行法律审查，除非当局采取了此类措施的权力首先得到法院的承认”。法院由此得出结论，“宪法不禁止法院对向它提出的申诉行使职权”。法院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宪法“绝不限制法院受理一项针对过去在已中止的紧急状态期间颁布的禁止回国令提出的请求人身保护的申诉”。根据宪法第 41(3) 和 41(7) 条的规定，法院自认有权考虑禁止 Inostroza 先生回国的行政命令是否“真正必要”。“只有当采取这种措施是为了避免治安受破坏、防止国家安全受侵犯而有必要”而且这种“必要性”得到证实时，“继续施行惩罚才算是符合宪法的”。提供证据证实这种“必要性”是行政当局的责任，而法院认为当局没有作到这点。因此上诉法院核可了请求人身保护的申诉，宣布 Tomás Inostroza 有权进入本国领土。

23. 但是最高法院却接受了内政部长的观点，认为行政当局根据宪法第 41(3) 条在紧急状态下行使职能不必受法律审查，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决。智利人权委员会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事实上将继续禁止 Inostroza 回国，“尽管采取这项措施的紧急状态已告终止，而且禁止回国为不合理——换言之，即完全不符宪法规定”。²⁵ 因此，在行政命令下被禁回国的智利流亡者很显然已无任何法律补救可援。

24. 在这些情况下，专题报告员重申，他因紧急状态立法仍然存在（特别是宪法的第二十四过渡条款和第 41(3) 条和第 41(7) 条）、法院传统职权仍然受到许多限制表示关切。鉴于这些理由，专题报告员过去高兴指出的那一项法律裁决只是例外，不证实人身保护令、早期人身保护令和保障等补救措施恢复了效果。

²⁵ 1983 年 12 月下半月团结报，第 170 期。

2. 军事审判权

25. 专题报告员在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分析了智利军事审判权的令人不安的扩大。这种情况始于1973年9月11日，到1981年3月宣布了第3655号政令，辅之以1979年10月22日第2882号政令（1979年11月9日《官方公报》）。²⁶ 专题报告员评论了这种程序性保障的演变，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所得的保障。²⁷

26. 此处应特别提及战事军事法院，这类法院的审判权是由1981年3月17日第3655号政令恢复的该政令的唯一条款规定，任何直接或间接造成武装部队成员或执法当局成员——加上某些政府当局成员——死亡或身体受伤的任何违法行为，不论属于什么性质，或“其性质和犯罪情节不能不说说明上述人员因为他们的公职身分而成为攻击对象的任何违法行为，应由战时军事法院”依此程序处理，并受为战争时期具体规定的刑罚管辖。专题报告员已经描述了军事法院如何制订它们的即决程序，对于诸如法律面前平等、行使权利时受到平等保障、人人有权为自己辩护等基本人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有这些权利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中都有规定，而且智利已核准了这个公约。²⁸

27. 1983年11月25日，这类军事法院开庭审判了5人（3名男子，2名女子），他们被指控参与了一次突击队策划的攻击。这个突击队被指称在1983年8月30日杀害了陆军退役少将、圣地亚哥市区行政长官Carol Vrzúa Ibáñez、他的警卫员Carlos Rivera和司机Jovge Aguayo。特别军事检察官要求将3名男被告判处死刑（Jorge Palma Donoso, Hugo Marchant Moga和Carlos Araneda Miranda），2名女被告（Marta Soto González和Susana Capriles Rojas）判处有期徒刑。他们和另外4人于1983年9月7日被国家情报局逮捕。根据1983年11月2日向第五刑事法院提出的控诉，那3名男子在被拘于圣地亚哥Borgoño街国家情报局秘密拘留所的

²⁶ A/38/385, 第50段。

²⁷ 出处同上，第51、第52段。

²⁸ A/38/385, 第54—58段。

两周中遭受酷刑。 1983年9月22日有命令将其中6名犯人隔离监禁，至1983年10月3日始撤除。 1983年10月6日，律师以原先7名犯人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要求人身保护，声称自从1983年9月22日，犯人为军事法院根据1981年第3655号政令在“没有关押决定”的情况下以“战时程序”提审。 申诉书认为战时程序不符合宪法第19(2)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为“无论在事实上或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实行这种军事审判权的前提条件”。 这些前提条件据称只有当“内外部处于战争状态、宣布紧急戒严令时”，始存在。 因此，“军事法院任意规定这是特别情况，作为借口审判那些在一般情况下应得到程序保护、由普通法院或和平时期军事法院审理的犯人”。 第二，申诉书还强调，战时程序不符合人人行使权利时应受平等法律保护的原则，因为根据宪法第19(3)条第4款的规定“任何人不能受特别委员会审判，只能受法律规定、根据法律预先建立的法院审判。” 申诉书说，它争议的程序之不合法，是同为目前不存在战争情况，而且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或“戒严状态”。

28. 1983年11月2日，那7个根据战时程序受指控的人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 请法院宣布1981年的第3655号政令不适用于战时诉讼，也不适用于上诉法院受理的请求保护的申诉。 申诉人的律师以第3655号政令“在形式上和在内容上都违反宪法”作为依据。 关于形式，律师指出，该政令是于1981年3月17日生效（在《政府公报》上发表之日），即宪法生效后第六天。 宪法第三、第四、第八、第九过渡条款已有规定，审判的依据要属法律性质，不能只属政令性质。 此外，这个有争议的政令不适当修改了军事审判法，而根据宪法第74条和第五过渡条款，军事审判法具有宪法基本法的性质。 关于内容，律师阐明说，第3655号政令违反了宪法第39条的规定（“宪法给予所有人的权利和保障只有在下述特殊情况下才受影响，内外部战争、内部动乱、紧急状态、普遍性的天灾”）。 由于“在目前的体制安排下，形势仅处于紧急状态或内部动乱状态，这些权利绝不应受到与战时情况同等的限制”。

29. 最高法院没有就该违宪诉讼的实质做裁决，但是它命令中止“战时”诉讼，因此，原定1983年11月25日开庭的战时委员会至今一直没有成立。

第一部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二、生命权、享有人身和人格尊严的权利

A. 生命权

30. 专题报告员把生命权称为“任何社会中的一项基本权利，不论该社会的发展程度如何，或其文化特性如何，因为这种权利是国际人权法中的一种强行法”。²⁹今年仍发生了多宗违反生命权的案件。受害者中少数是政府人员，据报为极端主义小组杀害。圣地亚哥市区行政长官 Carol Vrzúa Ibáñez 退役少将、警卫员 Carlos Rivera 和司机 Jorge Aguayo 遇刺一案前文已提到，与此案有关的诉讼正在进行中。³⁰在 1983 年期间，智利报刊已报道总共 8 名宪警被杀，他们的名字是：José Cofré、Manuel Valenzuela、Enrique Sandoval、Pedro Efrain Salas、Juan Cáceres、Héctor Fuentealva、Jos Miguel Jorquera、Francisco Pérez。³¹一些保护人权的组织和一些政治团体都公开地对这些违反生命权的行为表示遗憾。

31. 1983 年 11 月 11 日 Sebastián Acevedo Becerra 之死于康塞普西翁证实了近几个月来智利社会的紧张状态。Sebastián Acevedo 的两个儿子于 1983 年 11 月 8 日在科罗内尔被国家情报局逮捕，据称被禁在秘密拘留所里，遭受了酷刑。Sebastián Acevedo 担心他们的安全，设法与若干组织联系，希望知道拘禁地点，了解狱中状况，可是未能成功。1983 年 11 月 11 日，在绝望中为了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站在康塞普西翁教堂前面，全身洒上煤油，威胁说谁走近他就点火。一名宪警中尉想干预，Sebastián Acevedo 立即自焚，全身 90% 烙伤，几小时后在康塞普西翁医院去世。

1. 关于滥用职权、滥用武器的指控

32. 专题报告员向联合国大会报告了 1983 年 1 月到 8 月期间 40 宗保安机关

²⁹ A/38/385, 第 62 段。

³⁰ 见上文第一章 B 2 节，“军事审判权”。

³¹ 《今日》，1984 年 1 月 4 至 10 日。

滥用职权、滥用武器在冲突中杀人的案件。³² 大多数死者为保安机关在“全国抗议日”干预过程中滥用武器杀害。这些案件显然是保安机关直接违反生命权的行为。在1983年9月到11月期间，专题报告员收到了新的性质类似的报导，简述如下：

33. Ramírez González, Oscar Julio;
Zavala Gallegos, Miguel Angel (拉维多利亚);
Marín Novoa, Pedro Manuel (普达韦尔);
Gómez Espinoza, Nelson Fernando (拉格兰哈);
Alegría Arriagada, Sergio segundo (拉西斯特纳);
Iturra Contreras, Carlos (康塞普西翁)。

这6人死于1983年9月8日至11日第五次“全国抗议日”期间。据称他们为各种保安人员枪杀，律师已对保安人员不必要地使用暴力造成死亡提出控诉。

34. Ramírez Rubio, Robinson (孔查利);
Arellano Muñoz, Jorge Sebastian (圣河德里亚娜);
Ronero Reyes, Roberto Ronualdo;
Rodríguez Rodríguez, María Elena (瓦尔帕莱索);
Villznueva Ramírez, Sigfrido (奥索尔诺)。

根据智利人权委员会的报导，这5人也是在第五次“全国抗议日”期间，与前6人一样被保安人员枪杀。³³

35. Acuña Ballesteros, Reinaldo;
Barraza Enríquez, Eduardo Octavio;

这2个人也是由于宪警滥用职权致死。

Reinaldo Acuña在1983年9月3日背上中枪而死。据他父亲说，那名宪警“离他不到一米开枪，而本来是完全可以逮捕他的”。³⁴

Eduardo Barraza在1983年9月20日遭到2名宪警毒打而死。根据

³² A/38/385, 第63—86段; A/39/385/Add. 1, 第28—34段。

³³ 智利人权委员会，《1983年9月报告》，第12—14页。

³⁴ 同上，第77页。

智利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他死前以书面作证，声明他被带到拘留所，在那里遭到宪警毒打。³⁵

36. Vergara Valenquela, Lucía Ofilia;

Peña Díaz, Sergio;

Villavela Araujo, Jorge Arturo;

Ratier Noguera, Hugo Norberto;

Salgado Froquián, Alejandro.

这5人在1983年9月7日与保安机关两次冲突中死亡。据称这两次冲突同时在圣地亚哥的Las Condes和Quinta Normal行政区发生。国家情报局有关人员声称，5名死者于1983年8月30日参与暗杀圣地亚哥市区行政长官和他的两名警卫人员。但是，根据各方证词与案情追溯，令人怀疑所谓“冲突”只不过是“处决”的掩饰借口。³⁶

37. Durán Torres, Oscar Omar (17岁, 孔查利)。

他在1983年9月9日受重伤，1983年10月9日在医院死亡。在第五次“全国抗议日”期间保安部队向他开枪，击中要害。³⁷

38. Zamora Castillo, Pedro Germán (17岁, 比库尼亚马肯纳);

Pávez Pino, René Enrique (18岁, 比库尼亚马肯纳);

Gálvez Díaz, Raúl Fernando;

Orellana Pino, Silvia (普达韦尔);

Zabala Barra, Rubén Federico (17岁, 康塞普西翁)。

这5人在1983年10月11、12、13日的第六次“全国抗议日”期间参加示

³⁵ 同上。

³⁶ 同上, 第14、15段。

³⁷ 同上, 《1983年10月报告》, 第6页)。

威时死亡。在 Raúl Gálvez 案件中，他的亲戚于 1983 年 10 月 19 日向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提出了“因不必要的暴力致死”的控诉。³⁸

39. Fariás Naranjo, José Carlos (梅利皮亚)。

1983 年 10 月 27 日死者被宪警巡逻队拦截，不经解释毒打一顿，弃在街中，被友人救回。1983 年 11 月 12 日他的母亲发现他处于弥留状态，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40. Hugo Beiza, Victor Hugo (康塞普西翁)。

官方声称，死者在 1983 年 11 月 3 日与保安人员“交火”被击毙。但是，他的妻子在 1983 年 11 月 9 日提出控诉，指出：“尸体一只胳膊骨折，身上有烧灼和血肿伤痕，在被枪杀前显然曾受非法折磨”。

41. Mansilla Martínez, Ricardo (18岁，纽尼奥阿)。

1983 年 11 月 18 日在 O'Higgins 公园举行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快结束时，事件暴发，宪警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和喷水。据智利人权委员会报告，“一些目击者说 Mansilla 头部击伤。”另一些人说，他被一人造物体击中”。官方则说他死于“心脏梗阻。”³⁹

42. Opazo Lara, Luis Humberto (康塞普西翁，塔尔卡瓦诺)。

根据《康塞普西翁报》的报导，Luis Opazo 于 1983 年 11 月 3 日在塔尔卡瓦诺的 Las Higueras 村被身穿便衣的当地宪警开枪击中脊骨，死于 1983 年 11 月 5 日。死亡证书记载：直接死因是“双肺支气管肺炎”，原由于子弹“伤肺”所致。据死者兄弟说，“宪警让死者躺在血泊中，不把他立即送院，”企图给人印象“死者是被无名人士击伤。”⁴⁰

43. 以上 28 起违反生命权的案例，连同专题报告员在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述及的 40 起案例，表明 68 人在 1983 年期间由于不必要的暴力、滥用职权、

³⁸ 同上，第 7 页。

³⁹ 智利人权委员会，《1983 年 11 月报告》。

⁴⁰ 同上，1983 年 11 月 7 日。

滥用武器，在所谓与保安人员冲突中死亡。这个数字明显比前几年更高。专题报告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严重关切的问题，他赞同联合国大会对智利当局发出的“尊重生命权利和人身的尊严”的呼吁。⁴¹

44. 在1983年，法院每次接到关于安全机关人员滥用权利、滥用武器、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导致死亡的控诉进行司法调查，结果总不能澄清事实，惩办凶手。

45. 但是，专题报告员希望大家注意一项例外，这项司法调查查明了1983年9月11日杀害青年Pedro Manuel Marín Novoa的凶手，将他送交法院审判。1983年8月18日，当时的圣地亚哥行政长官Carol Urzúa Ibáñez发文通知圣地亚哥地区全体市长，命令他们出席聆听1983年9月11日庆祝军事政变十周年的“总统咨文”。通知说：“市政人员有责在市长率领下参加盛典”，每个市政当局必须尽可能大规模地发动市民“夹道欢迎共和国总统。”因此，布达韦尔市政当局命令最低限度就业方案(PEM)和户主职业训练方案(POJH)的工人们参加集会，召集了6,000名工人，其中包括Pedro Marín。据他母亲1983年9月12日向当地刑事法院提出的控诉说，“所有的公共汽车都挤满了人，还有成千上万人没能乘上车，在街头熙攘着。这时开来一辆扩音车宣布：参加集会并非为强制性……人们都大声欢呼，很快从公共汽车上涌下……突然，宪警乘一辆面包车和一辆旅游车到场，接着又开来一辆红色铃木牌吉普车。他们开始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和散沙弹”。从红色吉普跳下三个穿便衣的人，其中一个“向我儿子躲避的地方走来……恬然对准他射击，我儿子颈部受致命伤倒下”。在这次行动中，另有20人受枪伤，其中5人受重伤。

46. 后来，司法调查发现来自普达韦尔市政府的保安人员参与杀害Pedro Marín和伤害其他一些人。4名保安人员被交付法院审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1983年10月27日作出判决确认普达韦尔市市长Erigue Bajut Aguirre，“参与这些事件”是“杀害Pedro Marín、重伤Victor Hernán Núñez罪行的从犯。”该法院还确认了押禁另外4名市政府人员的命令，其中2人被控犯有杀人和致人重伤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第三人犯协从罪，第四人犯事后协从罪。

⁴¹ 1983年12月16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38/102号决议，第7段。

47. 针对保安人员被控从事政治性谋杀罪的几项冗长司法调查在本报告所涉期间一直在进行。第一项是对“为烈士报仇队”(COVEMA)案件的司法调查。在此案中，一些人在1980年7、8月间遭受绑架、审讯和拷打，其中一人为新闻系学生Eduardo Jara Aravena，因在拘留期间受刑死亡。⁴²根据智利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审查官最近公布警察局6名人员和2名侦探被押。⁴³在诉讼过程中，当时内政部的官员、国家情报局局长和圣地亚哥警卫命令都作了陈述。但是，死者的律师认为，“实际上学生Jara命案的调查几乎没有任何进展。”⁴⁴

48. 第二项是特别报告员已述及一直在进行的有关1982年2月25日工会领导人Tucapel Jiménez Alfara谋杀案的司法调查。⁴⁵1983年7月10日，工人Juan Alberto Alegria Mandaca的尸体被发现，据称是自杀，尸体旁边放了一封信，自认是谋杀了Tucapel Jiménez的凶手。工会领导人家属的律师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说：“工会领导人为辆车中8人小组所杀，其中有些人已被查明”。⁴⁶此外，Enrique Silva Cimma律师在1983年11月9日公开答复前国防部官员Galvarino Ancavil Hernández的说明性信件说：杀害Tucapel Jiménez毫无疑问“有国家情报局(CNI)的人员参与。”他们成立了一个“Delta”小组，专门“策划一系列的政治谋杀。”1983年11月11日，国家情报局向圣地亚哥第一军事检察官控诉该律师“恶意中伤，”并发表声明，说律师指国家情报局和它的人员与Tucapel Jiménez的死亡有关，纯属谎言。”声明说，“国家情报局从未策划杀害任何工会领导人，”而且负责审查的司法官也没有宣布“押禁任何人。”

⁴² 该案背景见E/CN.4/1983/9，第33段，以及A/38/385，第87段。

⁴³ 智利人权委员会，《1983年10月报告》，第51页。

⁴⁴ 同上。

⁴⁵ 该案背景，见A/37/564第30段，E/CN.4/1983/9，第31、32段，以及A/38/385，第88段。

⁴⁶ 智利人权委员会，《1983年7月报告》，第17页。

2. 死刑

49. 专题报告员在他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死刑的范围在扩大，目前适用于许多罪行。⁴⁷

50. 军事检察官曾再次要求对 Jorge Palma Donoso, Hugo Marchant Moya 和 Carlos Araneda Miranda 判处死刑。这 3 人在 1983-1 号案件中被控。该案涉及圣地亚哥行政长官 Carol Urzúa Ibáñez 退役少将的遇刺，被称在“战时”发生，故由陆军第二师司令部负责调查。⁴⁸ 1983 年 11 月 25 日开庭的军事法庭被最高法院下令暂时中止。专题报告员也重申其关于智利适用死刑、尤其是对政治罪适用死刑的意见。⁴⁹

B. 享有人身和人格尊严的权利

I.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51. 联合国大会重申其对智利当局的呼吁，要求终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⁵⁰

52. 专题报告员对 1983 年 9 月到 11 月保安机构继续违反人身和人格的尊严权利表示关切，违反的事例包括：一，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二，1983 年 9、10 月举行“全国抗议日”时向和平示威者发射子弹或散沙弹；三，保安机关在上述情况下向示威者喷水或施行殴打。

53. 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专题报告员先前已经向联合国大会汇报，在 1983 年 1 至 8 月间收到的总共 87 起控告。⁵¹ 此外，

⁴⁷ A/38/385，第 90—94 段。

⁴⁸ 见上文，第一章 B 2 节“军事审判权”。

⁴⁹ A/38/385，第 93 段。

⁵⁰ 联合国大会 1983 年 12 月 16 日第 38/102 号决议，第 7 段。

⁵¹ ⁵² A/38/385，第 97 段和附件一；A/38/385/Add. I，第 38 段和附件一。

还有 60 起类似的案件发生于 1983 年 9 至 11 月间，列于本报告附件一。因此，在 1983 年期间总共发生了 147 起酷刑或其他虐待行为，比去年增加了不少。用刑方法和早期相似，⁵³ 也包括各种恶毒形式，例如，头浸污水造成窒息，利器殴打、火灼、在体上最敏感部位通电等等。即使在普通的宪警站里，酷刑也已成为家常便饭，在拥有专门刑讯员、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国家情报局秘密拘留中心，更是经常发生。施刑的地方不仅是圣地亚哥市，而且也包括特木科、艾森、奇洛埃、伊基克、阿里卡、瓦尔帕莱索、比尼亚德尔马、康塞普西翁等城镇。保卫人民权利委员会医疗组（CODEPU）曾对专题报告员提出报告说，酷刑产生的后遗症，如严重头痛、失眠、抑郁、焦虑、受迫害心理、以及其他半神经半机体的综合症，不仅在受害者本人身上出现，而且在他家人的身上也出现。

54. 许多人权组织和其他机构考虑到情况严重，曾公开谴责酷刑的不断蔓延。例如，康塞普西翁大主教在 1983 年 11 月 12 日发表公开声明：“许多人被释放后都说他们曾遭受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而且为事后医疗检查所证实……。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必须再次谴责使用酷刑……，要求终止这种不人道、反基督教义的做法，坚持认为，凡是被怀疑有责任者，不论何人，都应送交法院审理。我们要求解散国家情报局”。许多公开声明中都提出要求，以解散国家情报局作为终止酷刑的先决条件。1983 年 11 月 14 日，共和国总统说，“国家情报局不会被解散，因为它是一个控制恐怖主义活动、保证全体公民安全的组织。”他还说，那些要求取消国家情报局的人“之所以怕国家情报局继续存在，”正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搞这类活动的人。”1983 年 11 月，在康塞普西翁城有总共 25 个人权和社会权利组织作出反应，发表公开声明，对 Sebastia Acevedo Becerra 的牺牲表示哀悼，要求：“立即停止任意逮捕、秘密监禁和酷刑，保证尊重个人尊严和基本人权，尊重人权组织，立即解散国家情报局。”

55. 专题报告员还必须对保安人员开炮伤人事件的增加，表示关注。本报告附件二列举了 80 个子弹或散沙弹射伤者名单，几乎全是在 1983 年 9、10 月举行“全国抗议日”期间为保安人员行动所伤。这类报告的数量比前数月或前数年

⁵³ A/38/385, 第 99、100 段和表 2。

高了不少。例如，一个人权组织以关心的个人名义向法院提出了463份关于1983年5月到11月间保安人员在圣地亚哥市用不必要暴力严重伤人的控诉，根据一个人权组织医疗队给专题报告员的报告，宪警和军事人员攻击市民示威队伍时，往往毒打示威者，甚至向房屋用大口径枪弹射击，制造暴力和恐怖气氛，对人们的精神状态产生严重的影响。在1983年5月到11月期间，上面提到的医疗队医治了1,079个病人，其中985人由于武装部队和保安机构的暴力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这985人中有101人身各处受到弹伤或铁丸伤，表明宪警广泛使用了武器，甚至非常规武器。此外，宪警在康塞普西翁城滥用催泪弹也使许多人受伤，造成一人死亡，破坏许多房屋，并使居民窒息。宪警的这种行为发生在“全国抗议日”和其他政治示威过程中，发生在郊区大规模检查期间，有时甚至没有任何政治起因。所有这一切表明，宪警对人民的行动越来越无法无天，严重违反了人身和人格尊严的权利，造成不可预测的社会后果。

56. 最后，专题报告员还收到许多关于示威者遭受袭击、挨棍棒殴打受重伤的报告。据人权组织的医务人员提供的资料说，宪警8至10人成群，用棍棒袭击赤手空拳的人群，高声辱骂，以死威胁，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甚至妇女、儿童和其他没有自卫能力的人，也是这些攻击的对象。上述医疗队检查了985人，其中有493人由于遭受棍棒、抢托之类器械猛击，全身多处受伤。还有110人身体不同部位为硬器打伤。88人脑部被击受震荡；38人遭受残忍、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受电刑，衣服被剥，脚底被人反复痛打，被抛出警车留置街头；8人身体不同部位被燃烧物灼伤；7人被利器刺伤；5人装警犬咬伤；3人眼球被铁丸射盲；1人肾部受伤；1人耳膜破裂。

2. 人身和人格尊严权利受司法保护的程度

57. 康塞普西翁法律协会理事会在1983年11月17日的一份公开声明中提醒注意：“最近，屡次有人提出严重控诉，指称有秘密拘留所存在……律师在履行其职务时，也碰到许多障碍……许多被拘留者遭受非法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这一切都清楚地证明，公然违反宪法的行为有增无减，严重损伤了个人的尊严以及我们国

那些要求释放的学生的被禁。一个自称是国家情报局某单位头目的官员承认，那些学生的确是被关禁在拘留所，并说他们中一些人将被释放，其他人则因根据武器管制条例犯罪，将交付法庭审判。但是，该法官未被允许会见那些被拘留者或与他们通话。由于法官 Brito 的行动，地方行政官向瓦尔帕莱索上诉法院对他提出一个惩戒性控诉，指称他越权，因为国家情报局拘留中心是军事机构。

61. 1983年11月11日，那些学生的律师要求上诉法院允许他们作为上述惩戒性诉讼当事人出庭，因为案件特别重要，其实质与他们的委托人有关。律师还指出，经法官 Brito 访问拘留中心后被释放的学生们说，他们遭受了“残忍的和羞辱性的待遇”。那些留在秘密中心的学生，后来被控携带炸药提交海军检察官审理，他们身上都有“受刑痕迹”。关于惩戒性控诉，律师指出，法官 Brito 访问秘密中心是为了进行“初步调查”，以便利律师履行职责，使委托人免受非法逮捕、拘留和酷刑，“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此外，还有下列问题：“国内继续存在习惯地、有系统地使用酷刑的秘密拘留所，”以及“根据宪法第90条，军队和警察的职责是保卫共和国社会秩序，国家情报局的人员应对军队和警察负责”。因此，律师认为，考虑到案件对于保证适当施行宪法保障的法律工作来说，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军队凌驾于行政、立法、并通过军事法庭凌驾于司法之上，被告在其绝对控制下难受法律保护”，因此，律师有合法理由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

家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法治和法律传统”。因此，法律协会谴责“近来令全国关注的非常严重的酷刑行为，对基本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一再违反。”它还指出，“任何酷刑行为都是刑法所指的‘普通罪行’。‘法院有责审理关于酷刑的指控，一丝不苟地对之进行调查，使犯有这种罪行的人得到应得的刑罚。’”声明还指出：“只有宪警和巡警有责维持治安。根据宪法，任何个人或团体，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也不得掌握非宪法和法律所明白授与他们的权力。”因此，“有些团体或机关享有和行使完全属于公安部队的权力，”这种情况是与现行立法相违背的，“当局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解散这类非法团体。”同时，声明还要求当局“撤除秘密拘留中心。”

58. 由于1983年9月至11月期间违反人身和人格尊严的事件明显地增加，专题报告员不得不指出，法院不能对违反人权行为的控诉进行调查，使情况变本加厉。但是，1983年10月28日有过一次例外的情况。圣地亚哥大主教于1983年7月19日针对根据宪法第二十四过渡条款的规定被逮捕和放逐的一些人受到虐待的问题向最高法院院长提了意见后，⁵⁴ 最高法院考虑到所提申诉的性质和严重性，全体决定指派“一名特别军事检查官，专门负责调查处理各项审判前的程序。”最高法院同意，军事检查官应该每隔30天向它报告一次审前程序进展情况。

59. 此外，主教会议在1983年12月15日所作的声明中，要求对保安机构，尤其是国家情报局，进行大改组，以保证它们按照国家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和法律办事。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酷刑、威胁、非法和卑劣的待遇。

60. 专题报告员还高兴地指出，近年来第一次有一个法官访问了设于比尼亚德尔马市La Habana街476号的国家情报局秘密拘留中心。这次访问是因为1983年10月27日凌晨有11名学生在瓦尔帕莱索市几个地区从住所中被劫持，律师以他们的名义提出人身保护令的申诉，比尼亚德尔马的Haroldo Brito法官乃以刑事诉讼法第317条为根据，于1983年10月28日由保安部队的成员陪同对所谈的秘密拘留中心进行两次访问，以证实它们的确是被用作秘密拘留地，并证实

⁵⁴ A/38/385/Add.1, 第44段。

三. 人身自由权和个人安全权

A. 人身自由权

1. 逮捕或拘留

62. 在1983年9月至11月期间，专题报告员继续收到不少有关各种国家保安机构进行任意和非法逮捕的证据。

63. 下面的表2显示，在1983年1月到11月期间，被逮捕的人数比1981年和1982年同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个表是根据智利一些与保护人权有关的组织提供的资料编制的。

表 2
被捕总人数

月份	1981	1982	1983
1月	61	121	33
2月	53	58	144
3月	115	236	376
4月	61	41	168
5月	289	74	646
6月	35	27	575
7月	61	54	264
8月	27	58	652
9月	33	102	774
10月	40	174	420
11月	96	31	254
合计	871	976	4306

64. 可以看到，1983年头11月被捕人数（4,306）比1981年（871）和1982年（976）同时期几乎高出5倍。也必须铭记，列入表2的是根据上述人权组织的资料计算的最起码的数字。

65. 从性质上看，在1983年9月至11月继续发生有选择的逮捕，共651宗。专题报告员指出，“像前几个月一样，逮捕仍主要以保护和促进人权工作者。工会领导人、犯言论罪者和天主教团体人士为对象。”⁵⁵

(a) 在公共集会上进行逮捕

66. 1983年9月至11月期间，在公共集会上和示威过程中，特别是10月和11月在圣地亚哥市及其他省举行的“全国抗议日”过程中，集体逮捕的数量继续在增加。表3表明，1983年1月到11月期间大多数逮捕（4,306人中3,655人）是在公共集会上进行的。这个数字是由许多智利人权组织提供的。

67. 专题报告员忆及联合国大会对“当局未能恢复人权和基本自由已引起人民日益激热的抗议，对这种抗议强行镇压的结果，已导致一系列有计划的公然侵害人权的事件，其中包括大批逮捕和无数人死亡；”⁵⁶ 表示关切。在这方面，专题报告员曾指出，“智利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的原因。”⁵⁷ 政府宣布的开放政策措施并没有能够应付这种形势。特别是1983年9月到11月继续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更说明了这一点。

68. 为简结起见，专题报告员下面仅提及1983年9月到11月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大规模示威。

69. 1983年11月3、4、6、7日，在圣地亚哥持不同政见者召集了一系列和平示威。包括一次“饥饿进军”和多次学生示威。大约有163人被警察逮捕，但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未受指控而被释放。

⁵⁵ A/38/385/Add. 1，第49段。

⁵⁶ 联合国大会1983年12月16日通过的第38/1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

⁵⁷ A/38/385，第18段。

表 3
过去3年头11个月公众集会上
的逮捕和个别逮捕情况一览表

月份	个别逮捕			公众集会上逮捕			被捕总人数		
	81	82	83	81	82	83	81	82	83
一月	61	30	31	—	91	2	61	121	33
二月	53	23	14	—	35	130	53	58	144
三月	115	38	74	—	198	302	115	236	376
四月	61	39	77	—	2	91	61	41	168
五月	50	32	41	239	42	605	289	74	646
六月	35	27	49	—	—	526	35	27	575
七月	46	16	44	15	38	220	61	54	264
八月	27	17	19	—	41	633	27	58	652
九月	33	34	131	—	68	643	33	102	774
十月	31	11	76	9	163	344	40	174	420
十一月	96	19	95	—	12	159	96	31	254
合计	608	286	651	263	690	3,655	871	976	4,306

70. 1983年9月8日至11日，全国各地举行了“第五次全国抗议日，”在圣地亚哥发生了多次事件，尽管大多数属于和平性质，仍有许多人仅在1983年9月8日，就有183人被捕送往第一宪警局。“第五次全国抗议日期间在其他城市被捕者，在伊基克有23人，科皮亚波有8人，利纳雷斯有40人，特木科有92人，康塞普西翁有41人，瓦尔的维亚据报载有206人，根据人权组织记录则是123人。1983年9月13日，宪警在瓦尔的维亚市对Corbi人进行大规模袭击，另有38人被逮捕。

71. 1983年9月22日，“无家可归”的群众3万人占领了圣地亚哥La Grania社区的空地，在那儿建立营地，与警察发生冲突，40人被捕。这些人因参与定居活动，在1983年9月底、10月初时居住地点受到限制。其后每次再发生占地，警察都驱逐占领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1983年9月30日在Santa Anita住宅区；150家占据一块土地，20人被宪警逮捕，1983年10月9日在Nunoa Villa Yungay区的占地运动中，宪警逮捕了7人。1983年11月7日，在El Pozo de la Cisterna的占地运动中，警察驱逐了49家的人，逮捕3人，他们都受到了虐待。

72. 1983年10月还发生了多次公开示威。例如，1983年10月4日El Teniente铜矿工人举行游行，40人被捕。1983年10月4日，Conchali区举行抗议“失业和警察镇压”的示威，26人被控及向警官砸石头扰乱公共秩序，被传送到警察法院，第二天全部被释放。1983年10月6日，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全国性罢课，提出一些要求，24人被警察逮捕。

73. 1983年10月11日至13日，与“第六次全国抗议日”配合举行公共示威，情况与前几次抗议相似。估计有300人在瓦尔帕莱索被捕。其中大多数送往瓦尔帕莱索和比尼亚德尔马的警局，另外有80人被送进瓦尔帕莱索监狱。11个人被控袭击警察送交瓦尔帕莱索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办理。1983年10月13日，警察在圣地亚哥冲散一次抗议示威，逮捕18人。一个人权组织报告说，他们大多数在警察局受到钝器毒打和虐待，其中15人在几小时内被释放，另外3人在第一宪警局拘禁5天。1983年10月14日，普达韦尔区的占居者举行一次抗议示威，有9人被逮捕。1983年10月13日，瓦尔的维亚学生团体举行一

次示威，有70人被捕。同一天在康塞普西翁有13人被捕，在伊基克有12人被捕，在科皮亚波有11人被捕，等等。

74. 1983年10月27日，“全国工人突击队”在“民主联盟”和“人民民主运动”的支持下举行了“第七次全国抗议日”。圣地亚哥市的新闻报导说，有145人被逮捕，人权组织也报告有67人被逮捕。此外有20人在康塞普西亚翁，5人在蒙特港、9人在瓦尔帕莱索、36人在瓦尔维亚被逮捕。

75. 1983年11月16日在国家情报局对面举行的示威也值得注意。这次示威的目的是要求解散国家情报局。警察逮捕了50个示威者，后来受到“制造公共骚乱”的指控被传送警察法院。1983年11月18日，“民主联盟”在圣地亚哥O Higgins公园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有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参加。当示威者正在解散时，警察向他们发动猛烈袭击，投掷催泪弹并开枪射击。50人被逮捕，其中大多数人第二天就被释放。1983年11月22日，孔查利区的木材加工厂突然起火，宪警与帮助救火队灭火的占居者发生冲突。“一名宪警的冲锋枪走火，击中了另一名宪警”。这场冲突引来了特别宪警部队，他们猛烈地袭击占居者。”⁵⁸ 结果，47人被逮捕，其中26人行动受限制。1983年11月17日，学生在安托法加斯塔市举行示威，10人被捕。1983年11月11日，在科金博举行的另一次示威中2人被捕。1983年11月9日学生在瓦尔帕莱索市举行类似示威，14人被逮捕。1983年11月18日，18人在塔尔卡市被捕。同一个时期，3人在奥索尔诺，1人在蒙特港被捕。1983年11月23日，一些被拘留者的亲属用链条拴在瓦尔帕莱索市Victoria广场的一扇门上，以引起公众对被国家情报中心逮捕人士的注意，宪警察进行干预，逮捕7人。

76. 专题报告员要提1983年11月期间保安部队对圣地亚哥地区一些新住宅区的袭击。这种警察袭击被当局称作“犯罪检查”，其目的在于“保护纠纷地区的人民”。其他非政府消息来源则把它们称作防止政治抗议的袭击。例如，1983年11月12日比奥莱塔的Herminio de la Victoria和Nunoa新住宅区受袭击，100人被逮捕。1983年11月15日，在普恩特阿尔托也发生了一次类似的袭击，112人被逮捕。1983年11月16日，在La Puincoya

⁵⁸ 智利人权委员会，《1983年11月报告》，第19页。

又发生一次袭击，97人被逮捕。1983年11月23日，在Renca新住宅区又有110人被逮捕。这些被逮捕的人后来未经指控即被释放了，他们所受的损失也未得到赔偿。

(b) 逮捕的任意性

77. 大多数个别逮捕和示威时的集体逮捕都是任意进行，没有法律依据。专题报告员坚持他的结论：“目前仍然有用逮捕来压制不满和和平抗议的做法”⁵⁹这种情况专题报告员在根据许多智利人权组织提供的资料编制的表4、中有说明。

表 4

1983年头十个月中被捕、被送交法院和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人数一览表

月份	被捕人数	被送交法院的人数	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人数
一月	33	4	-
二月	144	11	1
三月	376	14	-
四月	168	32	-
五月	646	88	-
六月	575	58	-
七月	264	18	-
八月	652	49	-
九月	773	94	3
十月	420	35	-
合计	4052	403	4
百分比	100	9.95	0.01

⁵⁹ A / 38 / 385 / Add. I, 第62段。

78. 表4表明，1983年头十个月有4,052人被捕，其中只有403人被当局送交法院审判，占被捕总人数的9.95%。这说明，其他被捕的人未经正式起诉即被保安机构释放。换言之，在这一时期，90.05%显然是被任意逮捕。此外，在403人中只有4人被当局送交法院，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占被捕总人数的0.01%。

79. 因此，专题报告员重申他的结论，“行政当局的广泛逮捕权利（宪法第二十四过渡条款和公共秩序及国内安全法）主要用来迫害那些没犯有任何恐怖主义行为的持不同政见者，其真正目的是在人民中间制造恐怖气氛，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的原则。⁶⁰

80. 表5根据各种智利人权组织向专题报告员提供的资料编制，对逮捕作了较详细的分类。

81. 表5表明，在1983年头十个月被捕的4,052人中，有1,214人被行政当局自行释放，未受任何指控（占29.9%），933人被送交法院，但未受到任何指控即获释，另有1,492人因犯轻微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法院受到指控。这三种数字加起来可以看出，有3,640个被拘留的人（89.78%）无罪获释，或者受到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指控都可以算是被任意逮捕。在全部被拘留的人中只有403人（9.95%）在法院受到指控，并因为据称犯有某种罪行而被交付审判。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保安部队进行的逮捕缺少适当、合理的依据。

82. 这些结论为圣地亚哥市一个从事人权活动的律师组织向专题报告员提交的另一份报告所证实。根据那份报告，1983年5月至10月间，行政当局在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指控532人犯有所谓违反国家内部安全法令的罪行。上诉法院对受指控的518人或者宣判无罪，或者驳回诉讼。10人受审，诉讼在进行中。只有4人根据国家内部安全法被宣判有罪。

⁶⁰ A/38/385/Add.1，第63段。

5

未经法院干预、仅根据行政决定进行的逮捕数字分析
(包括在全国进行的逮捕)

一九八三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1.	该月份内部逮捕总人数	33	144	376	168	646	575	264	654	774	420	4,052
2.	无罪释放人数	16	15	288	85	210	99	57	215	85	47	1,115
3.	仅根据行政决定被强行限制住所人数	1	—	34	—	—	10	13	—	40	—	98
4.	仅仅根据行政决定被驱逐人数	—	—	—	—	—	—	—	—	—	—	—
5.	被捕可是没有向法院控告任何罪名而获释的人数小计	17	15	322	85	210	109	70	215	125	47	1,214
百分比		51,52%	10,4%	85,64%	50,50%	32,5%	18,36%	26,52%	32,8%	16,19%	11,19%	29,9%
6.	向法院指控可是罪名不成立而获释人数	5	30	13	24	205	209	67	113	166	101	933
7.	不购成犯罪的触犯行为而被指控人数	7	88	27	27	143	199	109	277	379	236	1,492
8.	小计(6+7)	12	110	40	51	348	408	176	390	545	357	2,425
9.	无罪或只被控有轻微触犯行为而获释的人数小计 (2+3+4+6+7)	29	133	362	136	558	517	246	605	670	364	3,640
百分比		87,88%	92,36%	98,28%	80,95%	86,39%	89,91%	33,18%	92,51%	86,56%	91,43%	89,78%
10.	向法院指控并交付审判的人数	4	11	14	32	88	58	18	49	94	35	403
11.	在报告所涉期间的未决策	12,12%	7,64%	3,7%	19,15%	13,62%	10,99%	6,82%	7,49%	12,10%	8,33%	9,95%
百分比		—	—	—	—	—	—	—	—	10	1	11
该月份逮捕总人数		33	144	376	168	646	575	264	654	774	420	4,052

(c) 逮捕的非法性质

83. 许多逮捕，根据国际标准和适用的国内标准，不仅是任意的，而且也是非法的。在这方面，非法逮捕包括保安机构根据政治宪法第19条所根本没有权利进行的逮捕。国家情报局在1983年头十个月逮捕了175人，把他们禁闭在秘密拘留所里。在1983年9月至11月期间，继续发生其他用非正常行为进行的非法逮捕，例如，不经主管政府官员签发逮捕令而进行逮捕，逮捕时非法搜查住宅，保安人员施行虐待和不必要的暴力行为，等等，专题报告员是在其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已就此作了评述。⁶¹

2. 任意和非法逮捕受司法监督的程度

84. 专题报告员在其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指出，非法和任意逮捕特别少受司法监督。⁶² 在1983年1月至11月期间，被非法关在法律所禁止的秘密拘留所中的人士向圣地亚哥提出了141起有关违反判事诉讼法第317条规定的控诉，其中只有一起成功。1983年11月22日，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接受了以José Santos Tamayo Velásquez名义提出的人身保护令早期申诉，理由是：“自1983年9月起即被剥夺自由。”⁶³ 该法院认为，内政部第4352号豁免法令允许行政长官依据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所授与的特殊权力拘留有关人士，但是，“并没详细说明进行逮捕的公共场所”。这是一个法院第一次确认国家情报中心进行拘留的地点是保密的。这项裁决指出，逮捕令并未说明逮捕在由谁来执行，只是说这个人必须被拘留在国家警察、警察部或国家情报中心的基地。忽略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第1878号法令没有规定国家情报中心有权执行逮捕令，”又因为根据宪法第19条7(d)款的规定，拘留地点应该是“公开的”。这是一项重要的裁决，因为是十年来法院第一次裁决国家情报局没

⁶¹ A/38/385, 第125—131段。

⁶² A/38/385, 第132段; A/385/Add.1, 第68段。

⁶³ 见上文第一章B—1节：“补救办法的性质、可引用性和有效性”。

有合法逮捕人的权利，更不得将人拘留在秘密地点。专题报告员把这项裁决看作是一项直接涉及保护智利人的自由、人身与人格尊严权利的鼓舞人心的先例。

85. 另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是1983年12月14日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关于保护任何人不受任意逮捕的裁决，它关系到10个下落不明被拘留者的亲属在圣地亚哥大学社会学院举行绝食而被捕的事件。国家警察进行这次逮捕是根据学院院长的命令。上诉法院裁定逮捕是任意的，因为院长没有命令逮捕的合法权力。裁决进一步指出，任何人因违反国家内部安全法令被拘禁必须依据“有关命令、逮捕令或违反该法令的罪证。”在这样情况下，内政部“必须事先提出逮捕申请。”因此，拘留或逮捕令必须在拘留前发出。但是据报实际情况从不是这样。在许多情况下，人已被拘留达5天以上，所要求的法律手续才完成，而且后来被释放时得不到任何赔偿，或者还要被限定住处，无法向任何法律机构申诉。这个裁决在对任意和非法逮捕进行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B. 个人安全权

1. 关于迫害和恐吓行动的指控

86. 联合国大会重申其对智利当局的呼吁，特别是：“停止恐吓和迫害”。⁶⁴在这方面，专题报告员发现迫害和恐吓行为在1983年9月至11月期间继续发生，这从下面根据智利人权组织的资料编制的表6中可以看出。

87. 从数量上看，表6表明，1983年头11个月关于受迫害和恐吓的申诉达195起，与1981年同时期的133起和1982年同时期的101起相比有了大大增加。

88. 从性质上看，法院收到的关于迫害和恐吓的申诉表明，这些行为是严重的，有组织，有计划，“直接针对事先选定、同保护人权组织有关的人物”。⁶⁵专题报告员重申他的结论，认为这种迫害和恐吓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专门用来

⁶⁴ 联合国大会1983年12月16日第38/1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

⁶⁵ A/38/385/Add.1，第71段。

压制那些不满当前独裁制度的人物，不管他们的政治或哲学观点如何。⁶⁶

表 6

圣地亚哥：受到迫害和恐吓的案件

月份	1981	1982	1983
一月	21	4	4
二月	5	8	15
三月	7	14	13
四月	13	6	8
五月	20	5	17
六月	6	16	19
七月	19	5	22
八月	5	5	67
九月	8	15	5
十月	6	19	10
十一月	23	4	15
总计	133	101	195

89. 1983年9月5日以 Claudio Enrique Molina Donoso 的名义提出要求宪法保障的早期申诉可以为例。申诉人声称，他的亲属几天前被逮捕，受刑逼供他的行踪。警方对法院承认，逮捕是根据调查地方行政官 Carol Urzúa 遇刺案的总逮捕令进行，被告被疑为极端主义分子。1983年9月28日，以 Adriana del Carmen Espinoza Cid 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另一份早期申诉声称，国家情报中心在追捕她，因为她负责组织食物救济，所以认为她是危险人物。

⁶⁶ A/38/385, 第138段。

90. 另一例是 Hugo Edison Flores Zahata 案，此人在 1983 年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0 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了两份早期申诉。他是某新住宅区的领导人，曾参加 La Granja 的土地占领。他的家被非法搜查过三次，警察盘问他的妻子，逼她说出他的去处。于是，他自己去宪警部和警局报到，发现并没有逮捕他的命令。在他的申诉里，他说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为一些显然是国家情报中心的人员，不说明身份，也没有逮捕令，一直在搜索他，向他的家属施加了难以容忍的压力。

91. Héctor Alejandro Riquelme Lizana 也提出早期申诉，请求宪法保障，因为怕被国家情报中心逮捕。中心人员在 Aníbal Pinto 居民区搜寻他：他的家受到监视。他在申诉中说，“前几天圣地亚哥占居者受到镇压性围捕后，我完全有理由担心我的自由与安全，考虑到这些人的行为方式，他们无疑是警察或者属于象国家情报中心那样被赋予警察职能的机构”。

92. 专题报告员还得悉，在团结教区 Mario Insunza Bécquer 博士在 1983 年 12 月 16 日早晨受到了袭击，有人从一辆小汽车上向他的屋子和汽车发射了大口径子弹和燃烧弹。他当时和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家里。他就“谋害生命、人身尊严和财产的企图”向圣地亚哥第 13 刑事法院提出诉讼。据他的妻子说，这次袭击可能是有计划的，因为“我的丈夫签字要求解散国家情报中心。”第二天，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国家情报中心宣传部门的文章，指称“有人有组织地诽谤国家情报中心妄图导致它被解散。”文章说，“Mario Insunza 博士声称受到恐怖主义分子的攻击，把这事件归咎于国家情报中心”，事实上是参加了“诽谤国家情报中心的运动。”

2. 监狱中的拘押情况

93. 许多智利人权组织的资料表明，1983 年 10 月底，大约有 150 人因言论罪被拘押在智利各地的监狱里。国际红十字会报告说，在 1983 年 7 月下半月，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了因保安原因被拘押在智利中部和南部 25 所监狱里的 169 个人。⁶⁷ 专题报告员已经指出，这些被拘押者都因犯有“智利紧急状态法、

⁶⁷ 1983 年 9—10 月份《红十字会国际评论》，第 267 页。

特别是国家内部安全法、以及火器和爆炸品管制法规定的罪行，而被起诉或被判刑，但根据民主社会的法律，许多所指的行为都不算是罪行，甚至不算是最轻微的罪行”。⁶⁸

94. 此外，1983年9月26日通过的第18249号法令大赦各种犯人，或予减刑一年。但是这次大赦不适用于某类犯人，如严重的杀人犯、盗窃犯、贩毒犯等。它也不适用于违反国家内部安全法、火器和爆炸品管制法和第2621号法令（非法结论）的人，因此也不适用于因思想罪而被拘押的人。⁶⁹

95. 保卫人民权利委员会给专题报告员的一份报告说，智利监狱的拘押条件，特别是言论罪犯的拘押条件仍然是异常恶劣。犯人挤在潮湿、寒冷、狭窄的牢房里，卫生条件很差，常常受狱警的打骂。特别工作组与智利当局1978年7月24日达成的把因“思想”犯同“一般”罪犯分开的协议，至今仍未获得执行。

96. 其他已汇报的案件包括Oswaldo Bustos Saavedra案 1983年9月23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请求宪法保障的申诉，声称被单独禁闭在一间牢房里；Jorge Martinez Muñoz 1983年11月2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同样申诉，声称多受了两个星期的单独监禁。该法院的一个法官正式访问了Jorge Martinez的监狱，希望了解他的情况，结果拒绝了他的申请。

97. 1983年11月，几名圣地亚哥监狱的普通犯人越狱逃亡，据《La Tercera》报报导，有思想犯参与越狱，由于他们是“危险人物”，足以证明他们在幕后组织和策划。另外两名思想犯因被指称参与该监狱另一次逃亡被发现后受到折磨和人身攻击。另一项引人注意的情况是，一些女思想犯被拘禁在圣米格尔的男人监狱中。据报这些监狱的条件极为恶劣，女犯们组织绝食斗争，结果内政部派代表团访问她们，同意作出某些改变，改善狱中条件。

C.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98. 联合国大会再次敦促智利当局“调查和澄清因涉嫌政治而失踪的人的下落，将调查结果通知他们的家属，并惩办此类失踪事件的肇事者。”⁷⁰

⁶⁸ A/38/385，第139段。

⁶⁹ 1983年10月1日官方公报。

⁷⁰ 联合国大会，1983年12月16日，第38/10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

99. 专题报告员报告，对被拘留者失踪案件进行多年司法调查，只取得了微小的进步。⁷¹ 关于1973年10月Mulchén 镇18人的失踪案，专题报告员报告审查官在1980年12月29日宣布他没有司法权，管此案，应让康塞普西翁第三军事法庭受理，因为该案牵连到军人、宪警和平民三方面。康塞普西翁的军事法庭指派了一名军事检察官去调查该案（第446-81号）。军事法官根据豁免法认为诉讼不能成立，指出：“没有证据能够凭以识别可能的主犯，从犯或事后从犯”（第3段）。但是，在作出裁决之前，被指称为主犯、从犯和事后从犯的军人和平民都已先获赦免。军事上诉法庭1983年1月7日作出诉讼不成立的裁决后接到上诉，于1983年11月8日再次裁定，犯罪事实的确已得到证明，但是不能确定谁人与之有牵连。因此，军事上诉法庭裁定赦免不能适用，诉讼应等到指明犯罪者之后始能进行。

100. 审查官还调查另一宗第2-77号案件，关系到1976年11月29日到12月20日间10个人的失踪。根据内政部提供的旅行证件，其中9名失踪者已离开智利前往阿根廷的门多萨。但他们是在被捕之后离境的。调查发现，旅行证件纯属“伪造”，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伪造的“旅行许可证。”1983年3月，一个新的审查法官复审了这案，于1983年9月20日以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和伪造公文罪把两名国际警察组织官员，Jonge Moucado 和 Federico Infante，交付审判。该法官还发现，伪造被用作“掩饰剥夺他人自由罪行的花招。这种罪行是延续的，因后果不明，因此1978年的大赦令不能适用于它”。这个裁决很重要，因为是首次在失踪案中有两人受控。但是，经被告辩护律师上诉，上诉法院于1983年11月18日推翻了审查法官1983年9月20日的裁决，理由是，不存在剥夺他人自由的证据，“旅行证件”在刑法中的意思不是公文。几天以后，这案被提交最高法院，但至今未作出裁决。

101. 另一起以1973至1976年在市区被捕和失踪的70个人名义在1978

⁷¹ 见A/38/385/Add.1第79-82段，以及A/38/385第150-160段。

⁷² 见A/38/385，第155-156段。

年向圣地亚哥第十部门刑事法院提出的诉讼，现仍在进行中。该诉讼是针对 Manuel Contreras Sepúlveda 将军和其他国家情报中心的人员。普通法院自认无权，将此案让给军事法庭审理。后者应失踪人士辩护律师的要求，指派一名特别军事检察官负责此案。这个军事检察官作了简单调查后，于 1983 年 3 月 17 日将申诉驳回。军事上诉法庭于 1983 年 10 月 5 日推翻了这一决定，命令重审，立即传讯主犯 Contreras 将军，并进行较认真的调查。但是，时至今日，调查一直耽搁着。

102. 专题报告员还收到有关佩因地区 24 个农民失踪的报告。此案提交军事上诉法庭。圣地亚哥军事法官 1982 年 5 月 24 日发出部分停讼命令，其后又提出上诉。这 24 个农民是 1973 年 10 月被圣贝尔纳多步兵学校和佩因宪警分局的巡逻队逮捕的。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只作了两次调查，其实只是给法医研究所写了两封信，1982 年 2 月 12 日便结束调查，而且如上文所述，于 1982 年 5 月 24 日部分停止诉讼。最初听闻该案的审查法官相信这 24 个失踪农民确已被捕，认为必须首先确定他们的所在。后来发现，“法医研究所关于所谓失踪人士的记录”由智利外交部提交国际组织，其中包括了佩因失踪的 10 个农民的名字，但有些名字是捏造。

103. 最后，专题报告员要指出，失踪人士亲属联合会的成员继续受到恐吓。例如，联合会 1983 年 12 月 12 日发表声明宣布，它有 10 名会员参加了在圣地亚哥大学社会学院举行的绝食，抗议国家情报中心的活动和秘密监狱的存在，希望借此引起各方对失踪人士的注意。宪警逮捕了这 10 人，全是失踪人士的亲属。专题报告员在本章前文已经指出，圣地亚哥上诉法院 1983 年 12 月 14 日裁定他们的逮捕是根据学院院长的命令，而他“没有这样做的权力”。⁷³

⁷³ 见第三章 A. 2 节：“任意和非法逮捕受司法监督的程度”。

四、迁徙自由权

A. 自由进出本国的权利

104. 联合国大会，“注意到智利当局已准许为数有限的国民返国，但同时也注意到为此采取的措施是专横而有限制的”⁷⁴ … 再次要求智利当局尊重智利人民在本国居住和自由出入境的权利，而不施加限制或附带任何条件，并停止实行软禁（强行规定住所的禁闭）和强迫放逐。”⁷⁵

105. 专题报告员已经指出，“扰乱国内和平的危险状态”（宪法第24条过渡条款）依然有效。根据这一规定，共和国总统有特殊权力“拒绝那些传播宪法第8条所指各项学说的人士、被指控积极支持这种学说或有此名声的人士、或犯有违反智利利益的行为或对内部和平造成一种威胁的人士进入国家领土，或将他们驱逐出境”（该款(c)项）。此外，24条过渡条款在其最后一段规定：“对于根据本条款采取的措施，除了向下令采取措施的当局提出要求重新予以考虑的申请外，不能采取其他任何补救措施。”换句话说，对这种行政措施无法律补救。应该记住，宪法第8条指的是：“危害家庭、鼓吹暴力的学说，或属于极权性质、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国家或法律秩序的概念。”最后，也必须铭记，尽管“紧急状态”到1983年8月31日终止，紧急状态声明中有关宪法第41条第7款的规定则仍然有效。该款规定，在紧急状态终止以后，紧急状态期间采取的驱逐出境、禁止返回智利的措施，只要采取措施的当局没有明确将之撤销，就“仍然有效”。

106. 在这样情况下，恢复回国权利的司法权受到严厉的限制。例如，1983年11月2日，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对以工会领导人Hector Cuevas Sandovel的名义提出请求宪法保障的申诉作出裁决。这个工会领导人原根据政府1982年12月3日的决定被驱逐出境，后来又根据宪法第24条过渡条款和第41条第4款和第7款的规定被政府禁止回国。上诉法院在其判决中指出，根据宪法第41条第7款的规定，从共和国驱逐出境、禁止回国的措施，只要采取措施当局没有明

⁷⁴ 1983年12月16日大会第38/102号决议第六序言部分第6段。

⁷⁵ 大会第38/102号决议第9段。

将之撤销，即使紧急状态终止仍将有效”。判决又说，“根据我国宪法，在这种情况下，不必证实上述限制性措施适用，因为只要措施没有被明确撤销，禁止回国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上诉法院拒绝了该请求宪法保障的申诉。

107. 专题报告员已提到1983年12月7日圣地亚哥上诉法院作出的另一项裁决，后被最高法院推翻。它同上相反，接受了以 Tomás Fernando Lnostrosa Catalán 名义提出的一份类似的申诉。⁷⁶ 在此案中，法院自认有权审查紧急状态期间禁止回国的行政决定的是非曲直。

108. 1982年9月24日到1983年10月4日期间，智利政府根据其处理权限公布了11个名单，列出了3,562个被宣布准予回国的人的姓名。有些人权组织指出，这些姓名包括儿童、已死亡的人、从未被驱逐出境的人、外国人或正常居住智利的人。⁷⁷ 后来，智利政府于1983年10月28日宣布不再公布准予回国人的名单，只说总共3,421人将明确被允许回国。任何人想知道是否被准予回国必须向内政部官员提出书面查询。针对两个数字之差，政府在1983年11月16日又公布了这141名差额中66人的姓名，他们结果或是不准回国，或是“由于政府正在进行新的调查”而暂不准回国。⁷⁸ 最后，凡是11个名单里没有的人必须“向智利大使馆或领事馆表明要求回国的愿望，由使馆电询圣地亚哥，可迅速得到电报答复”。所以，名单上的人并不一定获准回国，还先需要待到政府进一步的批准。

109. 在1983年11月2日，被逐者回国委员会以11个名单公布的3,549人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申诉，指责内政部长“尽管公布了准予回国人士的名单……但不列在名单上的姓名仍然保密”，因此，“秘密文件还是比宣传性的名单更可靠一点”。这份申诉要求“任何禁止回国的判决必须让有关人士本人知道，或是个别通知……或全由《政府公报》公布”。

⁷⁶ 见第一章B.1节：“补救手段的性质、可用性和有效性”。

⁷⁷ 见1983年9月，被驱逐人回国委员会致联合国秘书长的请愿书。

⁷⁸ 智利人权委员会，《1983年11月报告》，第28页。

110. 根据这些情况，专题报告员必须重申其结论，指出：智利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字国，有义务遵从《公约》第12条第4款的规定，不应任意限制国民自由进出本国。⁷⁹ 智利政府应根据自己的名单公布禁止回国的人士的姓名。⁸⁰ 最后，专题报告员强调，智利被驱逐出境者的问题只有等到紧急状态法废除后才能得到解决，因为这是当局为继续禁止回国或以行政命令驱逐人出境的法律根据。⁸¹

B. 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111. 专题报告员报告，根据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扰乱国家内部安全的危险状态”声明），共和国总统可以“命令某人居住某特定城市地区，为时不超过三个月”。在这方面，应注意联合国大会已再次敦促智利当局“停止‘流放’人民（强行规定住所）”。⁸² 行政当局的权力具有司法性质（宣判限制居所或在国内流放），而且根据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的规定，法院无法控制这类行政措施。

112. 从下面表7中可以看出1983年头11个月中被行政措施限定居所的人数，可与1981年和1982年的相应人数比较。这也是根据许多人权组织向专题报告员提供的资料编制的。

113. 上表表明，1983年1月至11月，127人被限制住处，是1981年（59例）和1982年（41例）的三倍。1983年9月、3月和11月的案例最频。

114. 此外，据报被限定住处达90天的那些人的情况，尤为恶劣。他们被流放到离首都1400到2600公里的荒凉地区城镇里，面临身心健康受影响、食物供应不足、住房缺乏、闲散无聊等问题，还受到宪警的严格控制，与当地居民也格格不入。

115. 1983年12月23日，政府宣布为了让大家过好年终假日，年底将取消流放这种行政惩罚。⁸³

⁷⁹ A/38/385，第183段。

⁸⁰ A/38/385，第184段。

⁸¹ A/38/385/Add.1，第93段。

⁸² 联合国大会1983年11月16日，第38/102号决议。

⁸³ 《今日》周刊，1984年1月4—10日。

表 7

限定住处的案例

月份	1981	1982	1983
一月	11	3	1
二月	11	5	-
三月	5	5	34
四月	7	-	-
五月	15	2	-
六月	1	2	10
七月	1	2	13
八月	-	2	-
九月	1	11	38
十月	5	3	2
十一月	2	6	29
总计	59	41	127

五、隐私权、思想自由、意见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

A. 隐私权

116. 执行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时隐私权往往受到任意或非法拘禁等侵犯行为的影响。该条宣布的“扰乱国内和平的危险状态”继续生效。在这方面，专题报告员已指出，“非法逮捕、同时非法袭击住宅、恫吓家人、任意攻击个人和家庭名誉”的事经常发生。⁸⁴ 国家情报中心或宪警进行搜捕，在没有适当的进入、搜查或没收命令的情况下，是非法的，而这种命令只能由有关法院签发。

117. 关于非法进入私人住宅，1983年5月到10月间，一个人权组织提出了99份申诉，指控保安人员使用不必要的暴力，造成物质损害。其中一件是Guadalupe Fernández Melo的申诉，指称1983年9月8日“一伙头戴头盔、手持冲锋枪和棍棒的警察闯进我家”。其中一人“在门口用冲锋枪对准我们，另外9人口出谰言，把家中器具砸成粉碎。”同样，一名教士David James Murphy Collins指控有人企图放火烧他的房子。他说，1983年9月8日“3名年轻人走近我家，当时无人在内。他们淋浇汽油之类的液体，想点火，”看见他回家，“就用弹弓乱射石头”。

118. 另一些人提出一份控诉说，1983年9月9日，“大约15、20名戴着头盔和面罩的警察来到我们家……用力打开门窗闯进，左右开枪，不管是否伤人，发狂似地破坏一切，边干边辱骂，造成屋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的恐惧。”他们补充道，“这些警察都喝了酒，可以闻到很重的酒味”。最后，Juana de la Cruz Albornoz Cuevas提出的一份控诉说，1983年9月11日，一伙穿制服的警察“戴着头盔和只露眼睛的面罩，来到我家，企图带走一个孩子……用棍打他的头，还打我17岁的女儿的腿，留下明显的伤痕”，他的另一个儿子也挨了打。控诉说，警察“打碎了窗玻璃”而且临走时向屋里扔了一颗催泪瓦斯弹，引起家人和大群孩子的恐慌”。这个事件构成“非法进入，因为警察是强行进入我们屋子，并

⁸⁴ A/38/385, 第199段。

未得到我们的同意。” 控诉还谈到“财产的损坏、警察打破了窗户玻璃……并向屋
里扔石头。 他们采取了不必要的暴力，三个孩子，包括一个姑娘，都遭到殴打。”

119. 对于个人名誉的侵犯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警察调查 1983 年 8 月 30 日 Carol Urzuá 将军被刺案过程中，9 人于 1983 年 9 月 7 日被捕，其中有两人受到公开指控，大肆宣扬，但后来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报上关于被限定居新的人士的报导性质上也相似，他们往往受到诋毁而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例如，38 人在 1983 年 9 月 29 日被流放后，行政管理事务秘书长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这些人参加了暴力行动……已被证实是野蛮行为的煽动者”。 在 1983 年 11 月 26 日发布的限定居新命令中，政府也声明：“这些人参与了骚乱”。 报纸则写：“政
府流放了 26 名暴徒，因为他们参与了暴力行动，特别是攻击了扑灭 Conchali 大火的志愿火警”。⁸⁵

120. 个人名誉和道德尊严的权利同通讯工具经常不顾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而受
到损害。 1983 年 10 月 25 日警察逮捕 Claudio Gallardo Torres 案就是一例。 该报详细报导说，这个人“向警察开枪”，而且他“伙同一些人策划
诸如杀害警察夺取武器和制服这一类的武装袭击。” 报纸又报导，这个人是一个
“颠覆罪犯”，自认是“一个共产党员。” 报纸甚至还刊登了被指控人的照片，“带
着他们极端主义者同伴使用的武器。” Patricio Valenzuela 上尉的谈话也被报
导了，他说，“在审讯期间，罪犯供认，行动的目的是要干掉警察，偷他们的
自动武器，用之来袭击警局。” 报纸还登了国家新闻局的一项公开声明，指称：“该
犯参与了一个由共产党精心策划，指导和执行的煽动阴谋。” 1983 年 11 月 10
日， Claudio Gallardo 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他声称，在 15 天的拘留期间，
他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

121. 在一份类似的文件中，国家新闻局指责被禁止的基督教民主党的两位有名
领导人的政治活动是“严重叛国罪行。” 1983 年 11 月 16 日，这两个人就此对
这个官方机构的局长提起控诉，因为他们怕局长的话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可能

⁸⁵ 1983 年 11 月 27 日《民族报》。关于此事，见上文第三章 A. 1 (a) 节：“在
公共集会上进行逮捕”。

带来某种损害，包括对人身下毒手。

122. 前面，专题报告员已经谈到 1983 年 11 月 11 日 Sebastián Acevedo Becerra 在康塞普西翁自杀的前后情况。⁸⁶ 在这方面，政府当局暗示，自杀可能是出于精神失常。另一方面，智利精神病学协会会长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断言，“把一个绝望的父亲所作的决定，仅仅归因于所谓的精神问题，这是错误的、残忍的。”对这种决定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分析，“很可能先前的压力增大，”例如，“急于想知道儿子的命运，但因没能从有能力、而且有义务提供消息的人那儿得到回答和解释而感到失望。他周围人的冷漠的态度驱使他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以唤醒往往无动于衷的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注意。”这个声明提到了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非法逮捕，受害者的两个儿子，把他们拘禁在秘密地点。

B. 思想自由、意见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

123. 关于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专题报告员已经指出，这些权利受到宪法第 8 条的限制以及受到针对“其行为违背智利国家利益、威胁到内部和平的人”的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的限制。此外，根据宪法第十条过渡条款“停止政治活动”决不能“说成是《公约》第 4 条指的公共紧急状态下所允许的克减。因为，首先，紧急状态严格限于紧急局势，因此旨在长期中止《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布和《公约》第 25 条所保障的权利，即在拥有各项公民自由，无论是思想、行为或结社自由（这些是行使主要权利的方式）的情况下参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的政策，不能说成是实行紧急状态的理由。第二，‘停止政治活动’及军政权非法掌权似乎是紧急状态的根本起因，或其本身就是紧急状态。”⁸⁷

124. 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专题报告员也已提及，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让行政当局有可能对“发起、发行或散发新刊物”的权利施加大量的限制。”新刊物的发起、发行或散发须经内政部事先批准。但如前所述，大学的技术性刊物

⁸⁶ 见上文第二章 A 节：“生命权”。

⁸⁷ A/38/385，第 211 段。

和书籍的出版则不受行政当局的限制。⁸⁸ 专题报告员还注意到 1981 年 7 月 27 日的第 18015 号法令的限制，该法令对违反有关发起、发行或散发新刊物（如报纸或杂志）的规定的人或违反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对新闻言论自由的限制的人，规定了各种刑罚。

125. 专题报告员谈到 1983 年 8 月 30 日控告智利人权委员会和其他人权组织工作者 Fanny Pollarollo Villa 医生的案件。⁸⁹ 在诉讼以前，Pollarollo 医生直接参加了护理 1983 年 8 月全国抗议日期间被保安人员打伤的人，而且作了谈话，由《今天》杂志报导，讲到军队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国防部认为，这些谈话是“毁谤中伤，有损军人的尊严，”为此向政府检察官提出刑事诉讼。经过倒行片面调查之后，负责的军事检察官根据军事审判法第 284 条以“故意冒犯军队”的罪行将 Pollarollo 医生送交审判。这个检察官毫不考虑医生提出的许多有关使用暴力镇压抗议的控诉。这案由两个非军事法官和两个军事法官组成的军事法庭审理，法庭于 1983 年 11 月 11 日举行了一次听讯，命令“复审该案”，大概意味着一次新的审判。实际上，法庭的两个非军事法官主张推翻监押的判决，另外两个军队派来的法官则主张确认该判决。Pollarollo 医生的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了要求驳回判决，接着又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认为这案应按刑事诉讼法处理，因为它明显属于刑事领域，用军事诉讼程序是错误的。而且半数的法官们认为在该案中应该适用在可疑情况下只好相信被告的原则，即收监关押的判决应予推翻。1983 年 10 月 20 日，全国反对酷刑委员会声明，“公开谈军官们的行为的扰人问题绝不构成犯罪，更算不上是诬蔑军队。相反，它可以使军队避免失去民众的信心。”关于 Pollarollo 医生的谈话，全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说：“受害者及其家属已经对警察和军人不必要的暴力行为提出了许多指控，”这些事实证实了 Pollarollo 医生的谈话。

126. 专题报告员在 1983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也收到许多有关攻击言论自由的报告。例如，新闻记者协会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要求人身保护的申诉，说当

⁸⁸ A/38/385/Add. 1, 第 106 段。

⁸⁹ A/38/385/Add. 1, 第 108 段。

局 1983 年 6 月 18 日指示新闻局局长禁止报导抗议行动、罢工和没有法律人格的组织的言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进攻。1983 年 9 月 5 日，上诉法院驳回了申诉，理由是，不存在“禁止”，仅仅是“建议”而已。其他的指控是关于在全国抗议日期间逮捕记者和摄影师，以及在类似情况下对记者的侵犯行为。

127. 关于新闻自由，应当忆及，一个存在的组织“民主联盟”于 1983 年 9 月 29 日请政府准许它“平等使用通讯工具，特别是电视。”⁹⁰国家电视台台长拒绝了这一申请，争辩说：“这是政党言论，为现行法律所特别禁止……宪法第十条过渡条款有此规定。”

128. 1983 年 9 月，内政部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对《分析》杂志董事长 Juan Pablo Cárdenas 和为该杂志采取的非法组织“左派基督教”领导人 Pedro Felipe Ramírez 提出指控，声称：根据国家内部安全法令第 12927 号、特别是第 4(a) 条（“煽动或劝诱颠覆、反抗或推翻政府”），第 6(b) 条（“侮辱共和国总统或其他国家高级领导人”），和第 11(2) 条（“煽动罢工”），该杂志第 64 期（1983 年 9 月）由主笔签名的一篇社论和一篇 Pedro Felipe Ramírez 的访问都为犯法。1983 年 9 月 26 日，调查法官以违反第 12927 号法令第 4(a) 条、6(b) 条和 11(2) 条为由，将 Pedro Felipe Ramírez 交付审判，同时也以协从犯有后两项罪行为由将 Juan Pablo Cárdenas 交付审判。这两个人都被逮捕。在 Juan Pablo Cárdenas 一案中，上诉法院撤销了关于煽动罢工的指控，却认可了收监关押的决定。其后，这两个被告根据上诉法院 1983 年 10 月 17 日的判决被保释。这个杂志发表社论说“统治者的固执和任性必须对智利今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担负全部责任。”被采访者 Pedro Felipe Ramírez 谈到他对政治形势的看法，说，皮诺切特将军如不下台就不可能有和平过渡。对这两个人目前的控告是：Pedro Felipe Ramírez 犯有第 12927 号法令中第 4(a) 条和第 6(b) 条所指的罪行，但要求撤销对 Juan Pablo Cárdenas 的指控，因为军事检察官认为他的罪名应是“诬蔑军队。”在本报告编写时，专题报告员还未得悉有关这些诉讼的结果。

⁹⁰ A/38/385/Add. 1, 第 108 段。

六、公共自由权利

A. 和平集会权利

129. 专题报告员已谈到两个紧急状态之一没有延续，大有助于和平集会权的行使。自 1983 年 8 月 31 日起，最高行政当局不再有权“中止”这个权利。1983 年 9 月 15 日的第 1086 号法令第一次承认了这个权利，但规定它的行使须经批准。应该指出，后来的一些群众集会或示威都是经过批准的。但《扰乱国家内部和平的危险状态文告》（宪法第二十四过渡条款）则仍然有效，允许共和国总统“限制集会权”（规定的第 1(b) 段）。而且，专题报告员已谈到，执行宪法第 8 条和第十过渡条款是一种政治压抑，广泛地限制了公共自由权的行使。⁹¹

130. 除此之外，专题报告员也指出，1983 年 10 月 26 日颁布的第 18256 号法令，对第 1086 号法令和宪法本身产生了相反的影响。第 18256 号法令在有关国家内部安全方面对第 12927 号法令进行了修改。它规定：“未经批准即在街道、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鼓动或采取集体公开行动者，促进或煽动任何类型的示威、或允许、便利扰乱和平者；将受到‘中期的严格监禁、限定居所或任何等级流放的处罚’。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战时’，刑罚则是：‘长期严格监禁，限定居所或任何等级的流放。’”第 18256 号法令进一步规定，公开集会的组织者有赔偿在示威过程中造成损坏的责任，不管作恶者是否有责，也不管组织者的行动与所造成的损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⁹²因此这个法令大大限制了、甚至取消了宪法第 19(13) 条规定的保证所有人“不须事先批准、不带武器的和平集会权利”。

131. 再者，根据第 18256 号法令，行使和平集会的权利可专断地被看作可能危及国内和平。诸如“引起混乱或任何其他意在扰乱和平的暴力行动”、“公开侮辱国旗”、“囤积食品或水”、“为某种学说进行辩护或宣传，煽动从事暴力罪行”等等，现在都和未经批准举行公开集会“罪行”相提并论。

⁹¹ A/38/385/Add. 1, 第 111 段和 112 段。

⁹² A/38/385/Add. 1, 第 114 段。

132. 第18256号法令和有关公共集会的第1086号法令是一致的，表现了宪法第二十四过渡条款的滥用。根据该条款，行政当局可以限制但不能中止集会权的行使。第18256号法令则规定举行公开集会应事先得到批准，这实际上与两个紧急状态之一被取消以前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最后，在1983年10月，第五区和市区行政官命令，进行公共集会按所占面积收费。一家不能被怀疑为反对政府的报纸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乱增加使用费的办法，“很可能成为一种禁止群众集会的手段，这是对真正民主基本保证的集会权的一种侵犯”。⁹³

133. 此外，必须指出，召开一公开集会的人士很可能由于与其无关者或“内奸”的行为而受到第18256号法令所规定的刑罚（严格监禁，限定居所或流散）。在这方面，应该记得最近几个月的几次“和平抗议日”中都有人被杀和受伤，也应记得除了Pedro Manuel Marín Novoa案中政府官员被指控导致死亡而交付审判之外，司法调查一直没有澄清实际情况，也查不出谁是罪犯。⁹⁴有人推测这是为了企图掩护负责保护公共秩序的警察而把罪责加于无关的第三者头上。

134. 专题报告员严密注视最近几个月来和平集会权方面的发展。举行公共集会一般似乎都须事先申请批准。政府已经批准了一些公共集会，其中包括1983年10月6日的一次青年会议，1983年11月18日民主联盟在政府指定的地点举行的群众集会，以及1983年12月1日在瓦尔帕索也是在由政府指定的地点举行的群众大会。但是也有事先申请政府批准而遭到拒绝的情况。1983年9月23日申请举行一次新闻工作者会议遭拒绝即是一例，结果导致了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抗议。1983年10月20日全国工人指挥部举行公共会议的申请也被拒绝。1983年10月29日，圣地亚哥行政长官拒绝批准在Pedro Aguirre Cerda总统的纪念碑前举行效忠仪式的请求。1983年11月23日，在瓦尔帕索举行反对派会议的请求被拒绝。

135. 普遍禁止行使和平集会权的情况也存在。例如，在第八区，地区行政长官禁止在全地区任何街道游行，理由是保护“秩序、和平和健康的和平共处”。

⁹³ El Mercurio, 1983年10月31日。

⁹⁴ 见上文第二章A.1节：“关于滥用职权、滥用武器的指控”。

1983年11月10日，对游行的禁止扩大到一切类型的群众大会。该地区行政长官办公室争辩说，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考虑到一些团体和个人宣传鼓吹暴力和扰乱和平的学说，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些手段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法律秩序”。

136. 最后，应当忆及，许多人被逮捕是为了防止他们行使和平集会的权利⁹⁵。极其荒谬的是，有时人们参加政府组织的集会是被强迫的。1983年9月7日伊基克的省长向公职人员发布文告，命令他们“参加将于9月10日举行的全国解放十周年庆祝会”，同时警告说，“参加的责任”在于主管人。“他们要负责发动人参加庆祝会，由自己或另指派人对下属点名。为此，他们应列出各参加者的名单”。主管人被要求报告“参加这次大会的情况，特别是要说明有哪些人缺席及其原因”。在发布了这个命令后，伊基克行政长官撤销了省长的命令。另一方面，圣地亚哥地区行政长官的一个类似的命令则未被撤销，那个命令载在1983年8月18日的官方通讯中，它通知圣地亚哥地区所有市长，参加1983年9月11日举行的宣读“总统训示”的仪式是强迫性的。⁹⁶

B. 结社的权利

137. 专题报告员已经评述了宪法第19(15)条承认的“不经事先批准”的结社权。结社必须根据法律”，以享受法律人格”。然而，为了行使这一权利，宪法提到了一个尚未颁布的基本法。在这方面，应该指出，1983年11月19日，全国的报纸公布了“政党组织法案初稿，”据说是政府委员会起草的⁹⁷。根据这个法案，政党将由享有法律人格的公民自愿联合而成，且有助于发挥立宪民主制度的职能”。法案规定了一个解散政党的理由，只要宪法法院宣布那些宣传宪法第8条所指可能破坏家庭或鼓吹暴力的学说、或属于极权主义性质或基于阶级斗争的社会、国家或法律秩序的观念”的政党是违反宪法。该法案还把“个人联盟、

⁹⁵ 见上文第三章A-1(a)：“在公共集会上进行逮捕”。

⁹⁶ 见上文第二章A-1节：关于滥用职权或滥用武器的申诉。

⁹⁷ 见上文第一章A.1节：“1980年的政治性宪法”。

组织或团体非法进行政党性质的活动”作为一种罪行的特征。

138. 另一方面，1983年9月，一个名为“宪法研究小组”的非政府组织散发了另外一个“政党法规”草案，“每个政党都必须在它的原则声明中写上，它明确信奉智利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公约……，致力于促进它们的有效遵守以及对民主制度的尊重”。此外，一个政党可以因为其违反“反民主的行为”而为宪法法院裁决解散，这种行为包括：对立宪制度的破坏、可能危害人权的行为，或使用、煽动武装暴力。

139. 无论如何，应该铭记，在基本法颁布之前，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和“停止政治活动”的宪法第十条过渡条款仍然有效。同样，本文已经指出，宪法第8条对政治主张采取歧视性限制，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授予共和国总统绝对权力，禁止宣传宪法第8条所指的学说的人、或进行有损智利利益、构成危害国内和平行为的人入境，或将他们放逐。

140. 结果，在智利政治结社的权利仍然被禁止，因为1973年9月11日和1980年宪法本身规定，这种禁止在1989年以前、或有关的基本法公布以前，将继续实行。其他仍然有效的特别法規有：禁止政党的1973年第77号法令，中止一切政党活动的1973年第78号法令，解散一切党派、团体、组织或政治性运动的1697号法令。因此，各种政治性的团体或组织和许多工会性质的团体或组织事实上都仍然非法存在。它们不具有法人地位，所以它们的存在极不稳定，当局对它们事实上的承认是任意性的，使它们受到经常的骚扰，尤其是当它们试图参加智利的任何政治、社会或工会活动的时候。

C. 参加公共事务的权利

141. 专题报告员并未看到在1983年9月至11月期间关于行使这一权利有任何立法、司法或行政方面的变化。前面已经谈到，自从1973年9月11日，包括参加公共事务权利在内的一些权利已经被中止，而且根据1980年宪法，这种情况将一直延续到1989年，或“停止政治活动”结束的时候。此外，宪法第8条作为一条宪法原则提出了对各种原理和学说的政治歧视。这种情况仍然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21(3)条的规定相

违背的，并不接受“人民的意志为政府权力的基础”⁹⁸

D. 请愿权

142. 宪法第19条第(14)款承认了这一权利，关于它的范围和目的已作过评述⁹⁹ 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如下所述，是绝不受到当局鼓励的。 1983年12月5日，参加最低限度就业方案和户主职业方案的工人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改善圣地亚哥市各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他们争取把每个月的工资由4,000比索增加到12,000比索，把最低限度就业方案纳入户主职业方案中，发给退职工金，取消水电债务，妇女和工人得到较好待遇，让工人们从事生产工作，取得社会安全和健康权利，以及让他们的孩子免费受教育。 请愿书的时候，普达韦尔、拉芒斯特尔纳和拉瓜伊拉区的工人受到了警察的袭击。 警察使用了催泪弹、散沙弹和警棍、并向空中放枪。 结果好几个工人受伤，一个被催泪手榴弹炸伤，几天后身亡。 许多人——男女、儿童——遭到毒打，数目不详。 市区行政长官1983年12月6日宣布取消最低限度就业方案，不顾63,000名失业者。 他还宣布缩减雇主职业方案的项目，但未说明多少，针对他所谓的“完全、绝对是挑拨性和协调一致的煽动计划”。¹⁰⁰

⁹⁸ A/38/385, 翻239段。

⁹⁹ A/38/385, 第242—245段。

¹⁰⁰ 《团结》半月刊，1983年12月上半年。

第二部分

经济和社会权利

七、经济和社会权利

143. 1983年9月至10月期间，专题报告员未注意到任何与交大会的报告（A/38/385）中分析不同的新情况。因此报告员肯定了最初的结论，其内容见以下从上述报告中摘出的各段：

- A. 工作权、平等就业权：第246—256段；
- B. 工作条件：第257—261段；
- C. 儿童和青年特别保护的权利：第262—267段。

八 工会权利

A. 工会结社的权利

144. 大会再次呼吁智利当局“恢复充分享有和行使工会权利、特别是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¹⁰¹

145. 专题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¹⁰² 已分析了指导工会结社权利的法律体制。由于这些条款在1983年9月至11月期间未作出改动，应提出报告员交大会的报告。

146. 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理事会“结社自由委员会”审查了一系列智利侵犯工会权利的控诉。有一起控诉提到智利教育工会(AGECH)的法人资格被取消，这是经济部1983年1月21日以该工会“参与政治活动”为由，于第21号法令中作出的决定。¹⁰³ 1983年5月10日，圣地亚哥上诉法院一名法官下令恢复该工会的法人资格，理由是经济部提出的罪名未能在诉讼过程中确立。据此，结社自由委员会向劳工组织理事会提交了最后建议，得到理事会的批准。建议对“智利政府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行政措施，取消了智利教育工会的法人资格，从而侵犯了结社自由”¹⁰⁴ 表示遗憾。委员会回顾了“结社自由的原则，根据这项原则职工的组织不应通过行政措施被迫解散”因此要求智利政府“采取措施，修改法律，使法院具有有效取消职业团体的专有权力”，建议还要求智利政府撤消“职业团体参加政治活动的全面禁止，允许其根据本身要求为达到工会的目标参加政治活动”。¹⁰⁵

147. 专题报告员已提及1983年3月24日在智利一些城市里举行的反对经济危机和侵犯人权行为的示威。¹⁰⁶ 在圣地亚哥市，缉私队逮捕了227人，然后，

¹⁰¹ 大会1983年12月16日第38/102号决议第10段。

¹⁰² 第A/38/385号文件，第268—282段。

¹⁰³ 本案事由见第A/38/385号文件，第310和311段。

¹⁰⁴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1194号案例，第293段，第G.B. 224/9/17号文件，劳工组织理事第二百二十四届会议。

¹⁰⁵ 同上。

¹⁰⁶ 事由见第A/38/385号文件，事由见第A/38/385号文件，第119(12)号文件。

被捕者中有 16 人与以前被捕的 18 人根据行政法令遭到幽禁，并押往皮萨瓜。结社自由委员会收到了有关这些情况的控告，对其审查之后，委员会向劳工组织理事会提交下列建议，要理事会随时了解这方面情况：关于逮捕并流放包括几名工会会员及工会领导人在内的 34 人的情况。委员会向智利政府指出：“为反对工会活动采取剥夺自由、实行流放等制裁是违犯结社自由原则的”，并认为“用行政措施实行这种性质的制裁是不能接受的”。¹⁰⁷ 关于其他被捕者，委员会对“智利政府未宣布其被捕原因”表示遗憾。并痛惜逮捕行动，因为不存在证明司法当局掌握了有关人员的任何罪名的证据”。最后，特别是有关工会领导人遭受虐待，伤害和严刑拷打的控告，委员会表示严重关注，要求智利政府“对所控案例作独立的司法方面的调查，以便彻底澄清事实，发现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并加以起诉”。委员会并要求随时了解调查的结果。

148. 向委员会提出的另一起控告关于冶金工人工会联盟主席 Ricardo Lecaros Gonzalez 于 1983 年 3 月 18 日被捕事件，及警察强行闯进联盟总部。政府通知委员会，Ricardo Lecaros 被捕是因为“在总部发现了几袋内容危害到公共秩序与治安的小册子，共几千份”。¹⁰⁸ 委员会为此通过了一项临时报告，对“现已获释的工会领袖 Lecaros 先生曾遭受几天的拘留”表示遗憾。委员会回顾道，“对工会领导人采取防范性拘留的措施是对工会活动的干涉，是不可容忍的”并要求智利政府“对关于强行闯入冶金工会总部，没收其设备文件的控告作出答复”。¹⁰⁹

149. 递交结社自由委员会的另一控告谈到全国个体户手艺工人工会总部遭到袭击、及 1983 年 4 月 30 日 15 名会员在参加庆祝国际劳动节会议时被捕的事件。对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临时报告，声明“工会会址不受侵犯权利严格规定，政府

¹⁰⁷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 1191 号案例，前引书，第 446 段，第 G. B. 224/9/17 号文件，理事会第 224 届会议。

¹⁰⁸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 1186 号案例，前引书，第 584 段，第 G. B. 24/9/17 号文件，理事会第 224 届会议。

¹⁰⁹ 同上，第 591 段。

未经取得有关的法律许可证，不得进入工会会址”¹¹⁰ 委员会回顾道，“因其参加工会活动而拘捕工会领导人和工会会员，即使不久便释放，依然违背了结社自由的原则”。¹¹¹

150. 另有一起控告谈到，1983年5月1日全国工会协调委员会在圣地亚哥的Plaza de los Artesanos 广场举行了会议后，¹¹² 当局不允许召集这类工会性质的群众集会。对此，委员会认为“政府不允许群众在5月1日示威侵犯了工会权利”，并痛惜“由于5月1日在Plaza de los Artesanos 广场大规模拘捕和殴斗工人和工会领袖，行使示威的权利被压制了”。委员会对这些事件表示关注，指出，“根据控告内容，一批非军事人员参与了暴力行动，并协助警察冲散Plaza de los Artesanos 广场举行的会议”，要求智利政府“将对这批便衣人员活动进行的审判的结果通知委员会”。¹¹³

151. 递交委员会的第三起关于同一事件的控告谈到，炼铜工人联盟的一些领导人因组织并参加了1983年5月11日全国抗议日活动受到审讯，当日示威活动过程中，警方采取了行动。¹¹⁴ 对于审讯炼铜工人联盟领导人一事，委员会在临时报告中注意到了“智利政府的声明”，注意到“1983年9月23日，政府中止了对这些人采取的行动”。¹¹⁵ 委员会痛惜“在全国抗议日中保安部队枪杀了两人”，并要求智利政府“将目前对此案进行的判决情况通知委员会”，¹¹⁶ 并对“智利政府未答复有关警方阻止1983年5月11日全国抗议日活动而造成几百人被捕，几十人受伤的事实”表示遗憾，并要求政府“就这一事件提出意见”。¹¹⁷

¹¹⁰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1200号案例，前引书，第618(a)段，第G. B. 224/917号文件。

¹¹¹ 同上。

¹¹² 事由见第A/38/385号文件；第119(20)段。

¹¹³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1200号案例，前引书，第618(b)及(c)段。

¹¹⁴ 事由见第A/38/385号文件，第119(25)段。

¹¹⁵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1200号案例，前引书，第618(e)段。

¹¹⁶ 同上，第618(f)段。

¹¹⁷ 同上，第618(g)段。

152. 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还收到一系列涉及智利政府的控告。首先，控告提到1983年6月14日第二次全国抗议日中，保安机关活动造成命案4起，受伤者若干，以及600名工人的被捕。¹¹⁸ 委员会注意到智利政府的解释：伤亡“是由于有人利用示威采取狂暴行活，侵犯个人和私人财产而造成的”。¹¹⁹ 委员会在临时报告中痛惜“1983年6月14日发生的4人死亡和几个受伤事件”，¹²⁰ 并对“16名工会会员被捕，其中8名经行政措施遭流放”表示遗憾，指出“由于工会活动采取这种措施，侵犯了结社自由的原则”，认为“用行政措施实行这种性质的制裁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要求智利政府“将通过正常法律渠道进行的关于1983年6月14日4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情况的调查结果通知委员会”，并“将其对于十二名工会领导人和工会会员的审讯及／或逮捕的意见通知委员会”，委员会提出了该十二人的名单。¹²¹

153. 第二，第1212号案例谈到1983年7月7日全国工会协调委员会会址被强行闯入，其中用具、设备被盗窃，委员会五名领导人被拘留。这些人受到审讯，理由是他们违反了国内安全法，并被拘留到1983年7月16日，当天审查这一案例的地方法院因不掌握任何罪证，命令将五人无条件释放。¹²² 据此，委员会要求智利政府“就有关全国工会协调委员会会址遭袭击，用具设备被盗窃的控告提出意见，并向委员会转达”。¹²³

154. 第三，委员会收到控告，说工会领导人Maria Razas 和 Sergio Tvoncoso 及工会会员José Anselmo Navarrete 遭受了“野蛮的酷刑”。¹²⁴

¹¹⁸ 上述“抗议日”事由见第A/38/385号文件，第119(34)段。

¹¹⁹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1212号案例，前引书，第641段，第G. B. 224/917号文件。

¹²⁰ 同上，第659(a)段。

¹²¹ 同上，第659(b)段、(f)(一)及(二)段。

¹²² 同上，第646段。

¹²³ 同上，第659(f)(三)段。

¹²⁴ 同上，第648段：另见第A/38/385号文件，附件一及第A/38/385/Add. 1号文件，附件一。

据此，委员会在临时报告中表示“严重关注控告中详细叙述的酷刑”并要求智利政府进行“独立的、司法方面的调查”。¹²⁵ 委员会还要求智利政府将上述“有关酷刑控告的司法方面调查结果通知委员会”。¹²⁶ 关于“1983年10月7日炼铜工人联盟领袖Raul Montecinos遭受的绑架、酷刑和处死威胁”的控告，¹²⁷ 委员会要求智利政府提出其意见。

155. 第四，委员会收到关于炼铜业大批工会领袖和几千工人被解雇的控告。¹²⁸ 据此委员会要求智利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早恢复被解雇的工会领导人（控告提出共有34人）的职务”，要求有关公司“放弃取消工会领导人就业资格的程序，要求恢复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所有工人的职务”。¹²⁹ 委员会还要求智利政府“将旨在结束对工会领袖及工人采取的反工会不公平行动所实行的措施通知委员会”。¹³⁰

156. 最后，委员会收到关于炼铜工人联盟主席Rodolfo Seguel Molina先生1983年5月、6月及8月遭受法律处分、解雇和拘留的控告。¹³¹ 对于这一情况，委员会在临时报告中注意到了“智利政府放弃了对Seguel先生的三项法律处分”，但对Seguel先生“因参加第二次全国抗议日活动被防范性拘留了一个多月”。委员会认为Seguel先生“作为全国工会的一名主要领导人，已成为反工会不公正行动案例严重受害者”。¹³²

¹²⁵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1212号案例，前引文，第659(c)段。

¹²⁶ 同上，第659(f)(五)段。

¹²⁷ 同上，第651段。

¹²⁸ 同上，第652—654段。

¹²⁹ 同上，第659(d)段。

¹³⁰ 同上，第659(f)(六)段。

¹³¹ 同上，第655—658段。

¹³² 同上，第659(e)段。

B. 集体谈判的权利

157. 在行使这项权利的方面，没有重大变化。因此专题报告保留其对指导这项权利的法律的分析、以及他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所下的结论（A/38/385，第290—294段）。

C. 罢工权

158. 指导行使罢工权的法律没有变化，专题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对这一点已有论述。¹³³

159. 关于这方面的作法，应当提出，结社自由委员会审查了一起控告，内容是关于自1983年1月7日建筑工会在Colbun-Machicura水电联合企业组织的罢工。¹³⁴ 委员会得知的情况是：1983年2月21日，3名工会领导人在联合企业被捕“当时他们正煽动工会支持工人罢工”。¹³⁵ 1983年2月24日，三人获保释，但预审法官对其进行了审讯，理由是“违犯关于国家安全的第12, 927号法令罪”的事实已经明确。¹³⁶ 1983年7月14日，最高法院未能发现证实其罪名的证据，无条件释放了三人。委员会注意到：“作为起诉依据的第12, 927号法令，其刑事条例涉及到破坏水电及其他公用事业的运行，在公用事业单位非法停工或罢工或对此加以利用，从而扰乱公共秩序，破坏法定的公用事业的运行，或损害任何主要的工业”。¹³⁷ 据此，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两项最终结论：首先，作为起诉三名工会领导人依据的法律“对某些工会活动实行刑事惩处，这是不符合结社自由原则的”，¹³⁸ 其次，委员会提请智利政府注意：“不应仅由于组织或参加罢工剥夺任何人的自由或对其实行刑事惩处”。¹³⁹

¹³³ A/38/385，第295—300段。

¹³⁴ 事由见A/38/385，第302段。

¹³⁵ 结社自由委员会，第1184号案例，前引书，第79段，第G. B: 224/9/17号文件。

¹³⁶ 同上，第280段。

¹³⁷ 同上，第281段。

¹³⁸ 同上，第283(a)段。

¹³⁹ 同上，第283(b)段。

九、文化权、少数民族的权利

A. 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

B. 土著少数民族的权利

160. 专题报告员曾根据当时得到的材料，在其交大会的报告¹⁴⁰中分析了上述两个问题。此后，很少有材料反映报告中的情况发生了任何变化。因此，该报告中作的结论依然有效。¹⁴¹

161. 不应忘记，关于本章所谈的问题，大会再次敦促“智利当局保护和恢复智利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是维护土著居民文化特征、改善土著居民社会地位的权利”。¹⁴²

¹⁴⁰ 分别见第A/38/385号文件第307至321及322至334段。

¹⁴¹ 同上，分见第363段至366段及第367段至369段。

¹⁴²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11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十、结论和建议

162. 大会对由于智利维持特别法令，使各种紧急状况制度化，并颁布非民众自由表达意愿的宪法，其中的规定不但不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并且禁止、中止或限制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使，从而破坏了传统的民主法律秩序和制度，再度表示关切。¹⁴³ 军队掌握的特殊权力通过共和国总统扩及于行政、管理、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在代议制下从军人统治过渡到文人统治时期（到1989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门。¹⁴⁴ 1983年8月10日，内政部长宣布政府的目的是“发起与反对党的对话”，并重申达到“充分、开放的民主”的意图。因此，国务院研究了指导政治问题的基本法，还研究了各政党和国会在1980年宪法所确定的1990年前开始行使职能的可能性，就此作了宣布。¹⁴⁵ 但是，这至今还并不表明1980年宪法条款有任何变化。公民仍然没有任何法律渠道可以行使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为了申张这一权利，基本上全国各活动和舆论部门都参加了1983年5月至8月的“全国抗议日”和各种形式的示威，造成了大批死难者、受伤和被捕者。这种情况本身继续引起造成严重、粗暴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对策，严重有损于智利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所应尽的国际责任。¹⁴⁶

163. 关于紧急状态制度化，应当注意到：智利至今宣布的两个紧急状态中，有一个到1983年8月28日为止一直没有恢复。另一方面，在1983年9月7日，另一紧急状态，即“威胁国内和平危险状态”，则根据宪法临时条款第二十四款延长了6个月。结果，新闻自由仍然受到限制，但仅限制大学书籍和技术性刊物以外所创办、发行或传播的新出版物。政府已无权确定禁止任何人离开国境。行使集会的权利虽未能被取消，但依然受到限制。对通信、联系的内容再也不允许检查。两紧急状态之一没有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于人权的主体说来是有

¹⁴³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3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⁴⁴ A/38/385，第335段。

¹⁴⁵ A/38/385/Add. I，第120段。

¹⁴⁶ A/38/385，第335段末。

限的，而且未能显著地改变紧急状态的制度化。宪法的临时条款，特别是宣布“国内和平受威胁的危险状态”的第二十四款依然有效。而且，应当记得，“紧急状态是智利军政府本身于1973年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执政时创造的……维持如此长时间的紧急状态的确导致了传统的民主宪法秩序遭到实际的破坏。”¹⁴⁷ 在这情况下，大会要求智利当局“取消不断严重侵害人权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宣布紧急状态的做法，恢复法制原则、民主制度以及切实享受和行使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利及基本自由，而没有任何歧视”。¹⁴⁸

164. 关于程序保证，不恢复两紧急状态之一产生了积极效果：当局根据宪法第41(3)和(7)条“紧急状态规定采取措施时要求法律补救的保护已不再受到阻碍。但是，如果根据宪法临时条款第二十四款对某人采取行政措施，则要求宪法保护的申诉依然受到限制。实际上，1983年头10个月里，要求宪法保护申诉有622例，涉及遭受任意或非法拘留、迫害、威胁行径或流放者1,361人。大多数申诉被法庭拒绝，但有7例得到同意。大会重申深为关切“人身保护令的援救办法由于智利司法机构在这方面未充分行使其职权，如果行使职权也是极其受限制因而没有效果”。¹⁴⁹ 专题报告员再次强调“关于正当的诉讼和拘留的程序的条款是基本的条款，始终应具备这些条款”，此外，人身保护令和类似的补救措施不应自动中止，特别是在保护生命和人身安全和体格完整成为问题的时候，因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即使在社会紧急状态时期，这些也均属于不得加以克减的权利。¹⁵⁰ 在这方面，在智利真正恢复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将取决于能否立即中止宣布“国内和平受威胁的危险状态”，取决于能否恢复智利历来要求的、实行法制的民主传统”。¹⁵¹

¹⁴⁷ A/38/385, 第336段。

¹⁴⁸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5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⁴⁹ 大会第38/102号决议第4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⁵⁰ A/38/385, 第337段。

¹⁵¹ 同上。

165. 由于军事法庭在和平与战乱时都大大扩大了司法权限，普通法庭一般采取的程序保证依然受到严重损害，“这就对持不同政见者如何仅仅被怀疑是不同政见者的公民产生严重影响”。¹⁵² 在战时建的军事法庭，战时制定的罚处规定还在采用。但是“《军事司法法典》规定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因为该《法典》规定国家应处于战争时期”。¹⁵³ 1981年3月17日的法令——法律结束的战乱状态，作为行使这一司法管辖权的必要条件。这似乎也不符合1980年宪法，因为“它超越了宪法规定的限制和情况，限制了个人的权利和保障”。¹⁵⁴

166. 关于生命权问题，专题报告员注意到1983年的11起命案（3名军人8名警察），其中一些人是由恐怖主义袭击致死，另有一人因政治原因自杀。报告员还注意到68起命案，起因是1983年间不必要的暴力行动，传说同当局的冲突、当局的不适当措施及国家保安机关人员滥用武力。多数人死于1983年7月12日、8月11日、9月8至11日、10月11至13日举行的“全国抗议日”活动。专题报告员对受害者人数增加表示关注，回顾了大会要智利当局“尊重人的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利”的呼吁。¹⁵⁵ 关于司法机关对侵犯生命权的调查，当局看来无意说明“抗议日”中发生的命案，并拒不许建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普通的司法调查工作，除关于Pedro Mannel Marin Novoa的死亡的调查稍有进展外，一般至今尚未任何积极的结果。关于处以死刑问题，专题报告员坚持认为“目的是要‘逐步限制可判以死刑的犯罪数目，以期彻底废除死刑。与此同时，应立即废除政治犯的死刑’”。¹⁵⁶ 在这一方面，应当记得，1983年5月20日的第18.222号法案“从立法上规定强制性的死刑，而判刑本来至少可由法院裁定”¹⁵⁷。

¹⁵² A/38/385, 第338段。

¹⁵³ 同上。

¹⁵⁴ 同上。

¹⁵⁵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7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⁵⁶ A/38/385, 第339段。

¹⁵⁷ 同上

167. 大会再次呼吁智利当局停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做法”。¹⁵⁸ 专题报告员获悉了147起有关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情况。¹⁵⁹ 情况涉及147名向法院控告保安机关人员，特别是国家情报中心人员的受害者。控告的数目持续上升，酷刑手段的长期采用，使专题报告员再次得出这个结论：“酷刑和不人道的待遇仍然是负责维护治安和保护公民的那些机构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的习惯作法。这些机构利用了当局的容忍”¹⁶⁰ 另据报道，保安部队人员特别是在1983年7月至10月举行“抗议日”活动中造成了161起伤亡事件：¹⁶¹ 专题报告员还注意到，也是在1983年7月至10月“抗议日”活动中，保安部队人员袭击了一大批人，造成各种伤害。应记得“即使在紧急状态下，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的规定，也不准许克减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待遇。因此，还必须指出的是。各国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护它们的公民免受这种待遇”¹⁶²。

168. 尽管控告非法虐待和其他过分的暴力行为的数量在增加，对于享有身心完整的权利的司法保护仍然是不充分的。但是1983年10月21日，最高法院专设了一军事检查官，研究一些有关酷刑的控告，同时，一名非军事法官第一次去比尼亞德尔马的La Habana街476号秘密拘留所探看被国家情报中心扣押的人，其中有11名学生据说受过酷刑。关于这一情况，报告员已指出：“必须要痛恨并谴责治安机关享有不受惩罚的事实，因为治安机关不受惩罚就造成并无疑地鼓励了对基本人权的多种侵犯，常常采取以下各种形式：不公正的杀人行为、侵害人身安全和体格完整、非法逮捕、传播恐怖的违法队组的出现、迫害、劫持、侵犯住宅和财产和其他权利。”¹⁶³

¹⁵⁸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7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⁵⁹ 见第A/38/385号文件附件一、第A/38/385/Add.1号文件及本报告。

¹⁶⁰ A/38/385，第340段。

¹⁶¹ A/38/385附件二，A/38/385/Add.1以本报告。

¹⁶² A/38/385，第340段。

¹⁶³ A/38/385，第341段。

169. 享受自由的权利也是国际社会始终关心的问题。联大再次呼吁智利当局“停止任意逮捕和秘密监禁”。¹⁶⁴ 与1982年(976起)和1981年(871起)相比，1983年1月至11月这种监禁的数目(4,306)大大增加了。这是最低数字，只同明确的案子相关。从性质上说，这些拘留依然反映了“逮捕是有选择的这样一种倾向，逮捕的主要对象是：持不同政见者和那些被怀疑为对已建立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持有不同政见的人、那些参与促进或保护人权的人、工会领导人、……”。¹⁶⁵ 但是，大幅增加的逮捕是在公共集会时进行的，(1983年前11个月共4,306名被捕者中有3,655人属这种情况。)专题报告员再次指出：“严重的经济危机固然是个因素，但经济危机是与严重的政治危机密切联系的，而政治危机又是传统的民主秩序遭破坏造成的结果”，¹⁶⁶ 破坏持续了十年之久。此外大多数逮捕不是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进行的，而是用来抑制和阻碍日益高涨和广泛的人民和平抗议和不满情绪。(1983年1月至10月)，在4,052起逮捕中，只有403起(9.95%)提交法院审判，只有4人(0.01%)被指控犯了恐怖主义罪行。因此，专题报告员回顾道：政府的特殊权力“被用来迫害并没有犯下任何恐怖主义行为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居民中间制造恐怖的全面的气氛，以便阻止抗议”。¹⁶⁷ 4,052名被捕者(1983年1月至10月)中有3,640(89.78%)人无罪释放或仅被控犯了轻微罪行(任意拘留)。另外，这种逮捕行动除其任意性外，其非法性已由下列事实得到证实，即逮捕经常是由那些未得到法律授权的人进行的(1983年1月至10月国家情报中心的情报人员干了175起)，或如果由那些有权进行逮捕的官员进行逮捕的话，他们在逮捕时常不出示由一名依法有权签发这类命令的官员所签发的逮捕证。最后，对任意和非法逮捕的司法监督似乎还是不够的，对虐待被拘留者来说，尤其是如此。在1983年1月至11月期间，圣地亚哥的法院接到141起控告，因为不少人未经法院的指令便受到秘密监禁，禁止其与他人通讯。圣地亚哥上诉法院仅受理了一起上诉(Jose Santos Tamayo Velazquez案)。1983年提出的所有上诉均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弥补措施，

¹⁶⁴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7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⁶⁵ A/38/385 第342段。

¹⁶⁶ A/38/385, 第343段。

¹⁶⁷ A/38/385, 第343段。

以平反因政治罪名遭任意和非法拘留者，受害者显然没有寻求任何补救措施，据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太害怕或是重新得到自由就很满足了”¹⁶⁸

170. 个人享有安全的权利也是国际社会经常关注的问题。联大再次呼吁智利当局“停止进行恐吓和迫害”¹⁶⁹ 1983年1月至11月据传在圣地亚哥发生的恐吓和迫害行动的数目（195起）大大高于1982年（101起）同期和1981年同期（133起）的数目。专题报告员再次指出：这些行为显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系统的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迫害和阻止那些不同意或被认为不同意当前政治官僚体制的人以及那些想要维护已遭违反的人权的人。这些行为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¹⁷⁰

171. 监狱设施中的拘留条件威胁着监狱中的人的安全和健康的权利。到1983年10月底，因犯“政见罪”拘押在智利各监狱的人有150名。他们因各种犯法行为而遭起诉或被定罪，但是其中的许多犯法行为不是什么罪行，依民主社会的法律制度来看，连轻微的罪行也算不上尽管人权委员会特设工作组和智利政府最高当局于1978年7月24日就关于因政见罪而被拘留人归为特殊类别的问题达成协议，智利政府仍然把“政治犯”和普遍犯人放在一起。此外，关于犯人的分类和待遇的一般原则“似乎没有得到适当的尊重，也许这是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这一目的，也是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直接造成监狱人数的增加”¹⁷¹

172.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呼吁，在1973年至1977年间失踪的635人的下落还未得到政府的澄清。联大再次呼吁智利当局“调查和澄清因涉嫌政治原因而失踪的人的下落，将此项调查结果通知他们的家属，并惩办那些应对这类失踪情事负责的人”¹⁷² 智利政府尚未提出一起司法方面已完成或正在进行调查并澄清了真相，或已确定其罪行并加以惩处的案例。专题报告员再次提出这一结论：“只对相当少的案件进行了调查，”“所进行的“司法”调查只是一种形式，是极不充分的，其目的显然是确保驳回申诉，并把申诉这样处理了。”¹⁷³ 最后，“那些坚持要求当

¹⁶⁸ A/38/385, 第344段。

¹⁶⁹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7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⁷⁰ A/38/385, 第346段。

¹⁷¹ A/38/385, 第346段。

¹⁷²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6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⁷³ A/38/385, 第165段。

局履行其职责的人受到骚扰。”¹⁷⁴ 1983年，专题报告员得到消息，说为对付失踪的被拘留者的家属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逮捕，及防止其举行和平示威的行动。

173. 行动自由权一直是联大和人权委员会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委员会再次要求智利当局“尊重智利人民在本国居住和自由出入境的权利，而不施加限制或带任何条件，并停止实行幽禁（强行规定住所的禁闭）、放逐”。关于自由进出本国的权利，自1983年8月28日起两项紧急状态之一已中止，意味着政府已不再有任意阻止智利人离境的权利。但另一紧急状态的持续（“国内和平受威胁的危险状态”），意味着政府依然能够对那些宣传宪法第8条原则的人，那些被指控为或传说为为了这一原则进行活动的人，那些违背智利利益的人或那些威胁到国内和平（宪法临时条款第24款）的人行使拒绝其入境或驱逐其出境的权利。另外，根据宪法第41条第7款有关这类问题中政府在紧急状态中得到的特殊权力，即使在紧急状态结束后，依然有效。这样，政府依然有权拒绝任何人入境或驱逐其出境。这对智利人外流问题继续存在有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方面重新建立法治是不可能的，因为行政决定不受司法的管制和监督。智利政府在1982年12月24日至1983年10月4日确公布了十一批有权回国的人的名单，但1983年10月28日，政府宣布这一程序结束，并公布了3,421名有权回国者的统一名单。这当然是积极的措施，希望事实能证明这一人道主义的公布名单方法是切实的。但是，专题报告员必须重申，《公约》第12条第4款“禁止对每个人行使自由进入其国家的权利施加任何限制。”¹⁷⁵此外，不公布被禁止进入国家的人的名单的作法“首先妨碍了采取对有关的人的法律安全措施，其次妨碍了为适当估计形势创造有利的条件”。¹⁷⁶最后，解决智利的流放问题无疑在于立即废除紧急立法（宪法临时条例24条及第41条第7款），“因为紧急立法是在行政

¹⁷⁴ 出处同上。

¹⁷⁵ 大会1983年12月16日通过的第38/102号决议，第9执行段。

¹⁷⁶ A/38/385，第349段。

¹⁷⁷ 同上。

一级维持禁止进入国家或采用行政驱逐措施的法律依据，两种办法都构成了纯粹的政治流放。”¹⁷⁸

174. 在国内的行动自由和选择自己住处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因为共和国总统有权根据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限制住处（国内流放），法院不能调查这种行政措施（宪法临时条款24款）。1983年头11个月里遭到行政处分的人数（127）是1982年同期的三倍（41），1981年同期的二倍（59）。而且，这一措施在1983年是针对工会领导人和贫民窟的穷人实行的。

175. 专题报告员还对保护隐私权问题表示了关注。1983年5月至10月期间，一个人权组织在圣地亚哥安排了99起上诉，涉及士兵、宪警在非法搜查贫民窟时使用武力造成财产的损失。因为被控告者的官衔较高，上诉必须向军事法庭提出，尚未有结果。不少人的名誉和人格也受到影响。

176. 政治方面的思想自由和主张自由依然受到宪法临时条款规定的“停止政治活动”的约束。实际上，那些宣传宪法第8条原则的人、那些行动“违反智利利益”的人或那些“威胁到国内和平”的人（临时条款24款），他们的主张自由已被剥夺。专题报告员再次认为，根据《公约》第4条，“停止政治活动”的做法是无理的因为“紧急状态只能严格地限于形势的紧迫性”因而不能“用这样一种政策来作辩护：这种政策旨在长期中止《世界人权宣言》宣布的、公约第25条保证的主要权利之一，即，在享有一切公民自由的同时参与本国的政治生活的权利，不管是思想、行为还是结社的自由，而所有这些自由都是行使主要权利的途径”。¹⁷⁹此外，“停止政治活动”同“军政府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夺取权利似乎是紧急状态的基本原因或本身就是紧急状态”。¹⁸⁰

177. 从理论上说，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本来应由于两种紧急状态之一未恢复而受益，因为，1983年1月24日宣布的禁止新闻工具报导“恐怖主义行动或行为”的第37号的最高法令已被撤销。但是，根据宪法临时条款第24条，1983年9月9日的第376号法令仍然规定“任何新刊物创办、发行和传播”之前需要事先

¹⁷⁸ 同上。

¹⁷⁹ A/38/385/，第352段。

¹⁸⁰ 同上。

得到内政部批准。但这措施不适用于书籍的出版及大学的技术性刊物。但是，军方依然有最后管制权。尽管在书籍出版方面这是一大进步，但宪法第二十四条过渡条款“有可能被应用于其著作能被任意地认为是威胁到社会和平、‘停止政治活动’或国内治安法的那些作家”。¹⁸¹ 正是在这方面，专题报告员在1983年下半年收到一些关于侵犯主张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的控告。

178. 联大再次促请智利当局“恢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切实享受和行使及基本自由的，而没有任何歧视”。¹⁸² 专题报告员再次认为“关于在国际文件和准则中所理解的公共自由权利其行使实际上已被中止或至少由于同时应用宪法第8条和宪法第十和第二十四过渡条款以及各个部门通过的特别立法而受到很大限制。”¹⁸³ 但是，关于和平集会，自1983年8月28日两种紧急状态之一中止时起，从理论上说，这项权利的行使已不能禁止。1983年9月15日第1086号法令在10年内第一次承认并规定了集合的权利。但是，由于另一种紧急状态（第24款临时条款规定的“国内和平受到威胁的危险状态”）依然有效，共和国总统便依然可以“限制集会的权利。除了宪法第8条和临时条款第10款（“停止政治活动”）之外，1983年10月26日第18，256号法案对将来第1086号法令的有效性也提出疑问。该法案修改了国内安全法，增加了一种罪名：“未经许可鼓动或召集群众统一行动……加强或煽动示威……”。规定的惩处有：关押、软禁或中期流放。这样，第18，256号法案似与宪法第19条13款不符，与第1086号法令也不符，因为它禁止了未经许可进行和平集会的权利。第1086号法令生效、第18，256号法案对法令产生相反影响后，专题报告员注意到行使和平集合权利受到全面禁止，并且，会前必须征得许可已变成一般的规律。

179. 关于行使其他公共自由权利（结社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请愿的权利），1983年下半年并未出现法律、司法行政方面的任何变更。因此，专题报告员坚持其交联大报告中的结论¹⁸⁴。

¹⁸¹ A/38/385，第353段。

¹⁸² 联大第38/102号决议第5执行段，1983年12月16日通过。

¹⁸³ A/38/385，第354段。

¹⁸⁴ 见A/38/385，第355—357段。

180. 关于经济和社会权利、工会权利、文化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1983年下半年未发生重大变化，专题报告员重申其交联大报告中的结论。¹⁸⁵

181. 总之，专题报告员欢迎智利政府将它认为适当的材料提供给联合国秘书长，希望这反映了智利政府顺应当前形势，成为与联合国负责人权方面的机构、特别是人权委员会及其专题报告合作的第一步。“专题报告员希望，智利政府能按照其本身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固有责任，考虑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作出反应，提供所需要的合作。”¹⁸⁶

182. 从本报告审议的材料来看，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前景在今年全年看来仍是暗淡的。这情况造成了全国各阶层的日益不满和广泛抗议，使智利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人权造成更加不良的影响。专题报告员的观点是：基本问题依然是智利现政府继续无视《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及第2条的准则剥夺人民参政、决定民主制度形式的权利，无视智利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签署国对公约第25、26和第2条承担的专门义务。智利政府制决了一套立法、司法和行政的综合措施，用来剥夺这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并限制实现这一基本权利的所有其他权利和自由。但是，1983年8月，政府宣布“开明”政策。使人们看到一线希望。该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有：同一些政党开展对话、撤销两种紧急状态之一、一定程度地放松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一些流亡者回国的自由。然而，政治对话最终没有成功。同时，政府为消除两种紧急状态之一中止后产生的积极影响，加紧采取措施，使人难以相信政府能实现在短期内恢复民主秩序的目标。

183. 专题报告员希望，智利政府采取新的切实措施，表明、而且立即实行恢复民主秩序的承诺，解除影响到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宪法限制，特别是宪法第8条涉及政治歧视的规定。

184. 因此，兹建议大会号召智利政府同人权委员会及其专题报告员进行必要的合作，以促进和保护智利的人权。智利政府应立即结束以国内和平受威胁为由的紧急状态，立即采取步骤，恢复传统民主秩序：恢复司法部门的审判权限制军事法

¹⁸⁵ A/38/385，第358—369段。

¹⁸⁶ A/38/385，第370段。

庭，只能受理在保障基本人权的民主制度下允许的案件，废除任命陪审法官的新做法，充分恢复司法部门的独立性。为此，政府尤不应对司法部门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施行所谓的制裁（Brito 法官所受的制裁为一例），或采取其他有损这种独立性的措施。政府应采取充分措施，确保包括执法人员和武装部队在内的一切人充分尊重生命权、身体与精神的尊严、人的自由与安全权、隐私权、思想、主张和言论自由等。如发生侵犯权利事件政府即应采取措施，进行充分调查，以便使受害者得到补救。政府还应立即采取彻底措施，调查已发生的失踪事件，确保在调查中给予失踪者的亲属以一切可能的便利，对失踪事件肇事者进行起诉，作出惩治，制止国家情报中心人员和不属于正规警察的任何其他人肆意进行逮捕和拘留，保证各级官员停止酷刑做法，如有人提出控告，即进行彻底调查，以向受害人提供补救。政府应立即查封秘密拘留点，恢复在国内自行选择的住址居住的权利、进入和离开本国的权利，停止国内流放的做法。政府又应恢复工作权，恢复工人享有适当就业条件、不受基于政治或其他非法原因的歧视的权利，让儿童与少年在工业领域享受特殊保护，让工会恢复结社的充分自由及这一自由所包含的一切权利。国家应承担教育领域里的充分责任，为此调拨足够的资金。受教育的权利与文化权利不再受歧视性做法支配，教育与文化政策方面的决策应由有关人员参与，各大学的自主权应予恢复。最后，政府应根据智利依《公约》和普遍适用的准则所承担的义务，实行土著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

附件一

一、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60人名单

(1983年9月至11月)

1. Abarca González, Juan de Dios
2. Acevedo Saez, Galo Fernando
3. Acevedo Saez, María Candelaria
4. Aedo Sepúlveda, Silvia Eliana
5. Araneda Miranda, Carlos Alberto
6. Astudillo Hernandez, Carlos
7. Barahona Vega, Oscar Fernando
8. Borquez Arredondo, Lázaro
9. Borquez Arredondo, Olmer Galvarido
10. Briceño Azócar, Gunther Andrés (15 years old)
11. Capriles Rojas, Susana Alejandra
12. Carre Tornatore, Raúl
13. Castillo Soto, René Osvaldo
14. Cea Torres, Ethel Paz
15. Concha Sandoval, Luis Roberto
16. Contreras Henry, Oscar
17. Cotroneo Insunza, Patricia
18. Crisosto Muñoz, René Osvaldo
19. Díaz Alarcón, Ximena
20. Donoso Henn, Ana Luisa
21. Farias Ogaz, Rosa Juana
22. Fernandez Cuevas, Mario Ernesto
23. Fierro Saez, Enriqueta
24. Fuentes Millares, Héctor Ramón
25. Grau Mascayano, Juan Pablo

26. Henriquez Reyes, Andrés Ruperto
27. Jofré Waghorn, Jeanette
28. Jones Lavin, Cristian Belisario
29. Lira Trujillo, José Luis
30. López Tejo, José Luis
31. Marchant Moya, Hugo Jorge
32. Méndez González, Alejandro
33. Mix Jiménez, Patricia Eliana
34. Molina Donoso, Rodolfo Orlando
35. Molina Mardones, Raúl Orlando
36. Molina Molina, Rodolfo José

37. Morales Riquelme, Juan Carlos
38. Muñoz Bustos, Abraham
39. Muñoz Bustos, Fernando Rubén
40. Muñoz Bustos, José Albino
41. Muñoz Bustos, José Luis
42. Muñoz Herrera, Margarita Jeanette
43. Navarro Díaz, Patricia Carolina
44. Ortíz Correa, Adriano Santiago
45. Palma Donoso, Jaime
46. Palma Luna, Antonio Vicente
47. Parra Mora, Iván
48. Pazó Flores, Ana María
49. Peña Salazar, María Eugenia
50. Pérez Moreno, Ramón Belisario
51. Pizarro Riquelme, Edgardo Arturo
52. Ramos Muñoz, Marco Antonio Fabriciano
53. Riquelme Brantes, José Antonio (17 years old)

54. Rodríguez Torrent, Juan Carlos
55. Rojas Toledo, Vilma Cecilia
56. Sanhueza Debelli, Fabiola Cristina
57. Sepúlveda Reyes, Margarita
58. Soto González, Marta Silvia
59. Valeria Sales, Helia Irene
60. Zepeda Cañete, Gustavo

附件二

被保安部队枪伤的 80 人名单
(1983年9月、10月)

1. Aguilar Gamboa, José Luis
2. Aguilera Tapia, Juan Carlos
3. Alegría Millaqueo, Manuel (tear gas)
4. Allendes Pinto, Gustavo Washington
5. Araya Araneda, Alejandro (16 years old, lead shot)
6. Arenas León, Alejandro (lead shot)
7. Arredondo Solís, Jorge Armando
8. Astorga Bustos, Eduardo Alejandro (15 years old)
9. Baeza Castillo, Emelina del Carmen
10. Bizama Loyola, Humberto
11. Bustos Rivera, Eduardo Iván (lead shot)
12. Cáceres Pérez, Carlos Orlando (17 years old)
13. Cáceres Salinas, Wladimir Fernando (17 years old)
14. Cádiz Soto, Anselmo Urbano (lead shot)
15. Cairel González, Alejandro Arnoldo (lead shot)
16. Cerda Navarrete, Eduardo Enrique (tear gas)
17. Cofré Morán, Omar Raúl
18. Colileo Melín, Juan Antonio
19. Cortés Salazar, Roberto
20. Cruz Arellano, Guillermo
21. Chancao Figueroa, Ruth
22. Duarte Muñoz, Manuel (lead shot)
23. Escobar Martínez, Sergio
24. Fuentes Campo, Fernando

25. Fuentes Campo, Pedro Juan
26. Garrido Velasquez, Margarita del Carmen
27. Godoy Zamora, Jorge Diógenes
28. González Caro, Héctor
29. González Valenzuela, Carlos Eduardo
30. Heredia Villablanca, Ovidio (disabled)
31. Hernández Llanquilef, Víctor Manuel (lead shot)
32. Herrera Pérez, Jaime Eduardo (lead shot)
33. Hervia Añíñir, Norma Eliana (lead shot)
34. Hinojosa Retes, Jessica (13 years old)
35. Leiva Contreras, Juan
36. Leiva Contreras, Luis Antonio
37. Lillo González, Julio César (lead shot)
38. Lizana Sepúlveda, Jaime Humberto (lead shot)
39. López Pino, Enriqueta del Carmen (13 years old)
40. Llamini Ortíz, José Miguel
41. Mazaeda Monsalve, José Adolfo (lead shot)
42. Mendez Avello, Leontina del Carmen (lead shot)
43. Merino Moreno, Cristián (lead shot)
44. Millal Sandoval, Juana
45. Montecinos Díaz, Dámaso Ulises
46. Muñoz Bravo, Guacolda del Carmen
47. Naranjo Daza, Aurora
48. Norambuena Carrasco, Esmeralda Rosa
49. Núñez Alvarado, Victor Hernán
50. Núñez Olea, Olga Mercedes
51. Osorio Arévalo, María Elena (12 years old, lead shot)

52. Palacios Sotelo, Claudio
53. Palacios Sotelo, Robinson
54. Pereira Villegas, Roberto Armando
55. Picón Díaz, Orlando Javier (17 years old)
56. Pino Ruiz, Jaime Hernán
57. Pizarro Iturriaga, Luis Roberto
58. Puga Salinas, José Alejandro (lead shot)
59. Rivas Muñoz, Juan Octavio
60. Riveras Silva, Margarita Olga
61. Rodríguez Neira, Gerardo
62. Rodríguez Olivares, Pablo (lead shot)
63. Salinas Rivera, Jorge
64. Sandoval Placencio, Iván Jorge
65. Segura Hidalgo, Edgardo (18 years old)
66. Sepúlveda Santibáñez, Richard Antonio
67. Sierra Sánchez, Salvador (18 years old)
68. Silva Gutiérrez, Tomás Oscar (lead shot)
69. Soriano Ducau, Rodrigo Andrés (14 years old)
70. Soto Astete, Elías Ernesto
71. Tapia Lastra, Luis Alberto
72. Toledo Godoy, Marco Antonio
73. Torres Rubilar, Héctor Antonio (18 years old)
74. Urrutia Padilla, Benito Ignacio
75. Varas Villablanca, Rubén (lead shot)
76. Vilches Núñez, Ramón Luis (lead shot)
77. Villablanca Rivas, Lenin Juan (lead shot)
78. Villalobos Briones, Lucía (lead shot)
79. Villatura Retamal, José
80. Yáñez Ribera, Luis Heriberto (19 years old)

*** *** *** *** ***